

分类号 F83/567
U D C

密级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研究生姓名: 张轩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马润平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研究方向: 金融理论与政策

提交日期: 2024年6月3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提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张轩 签字日期： 2024.6.3

导师签名： 张轩 签字日期： 2024.6.3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张轩 签字日期： 2024.6.3

导师签名： 张轩 签字日期： 2024.6.3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haanxi Province

Candidate : Zhang Xuan

Supervisor : Ma Runping

摘要

目前，中国正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建设，这一时期被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启动阶段。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所处阶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基于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全面认识，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观点。据此，形成了一系列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政策决策，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的首要任务。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融合了数字化和普惠性的金融服务形态，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能够有效地支持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求。因此，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并充分发挥其普惠性和精准性，对于推动陕西省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文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特征和内涵，并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影响机制，对陕西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了熵值化和标准化处理。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本文详细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三个主要维度（覆盖广度、发展深度、数字化程度）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并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其影响效果。

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高质量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在经济发展较慢地区和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效应更为显著。特别是在陕南地区，相较于陕北和关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面影响更加突出。进一步的影响机理检验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创新投入和网络发展等途径促进陕西省的高质量经济增长。基于这些发现，文章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加强技术创新支持、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加强风险防范机制，以期为陕西省乃至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经济高质量发展 熵值法

Abstract

Currently, China is vigorously adv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untry, a period considered a critical initiation phase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conducte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stages of China's development.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and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s in modernization, it has proposed a significant viewpoint tha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is transitioning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sequently, a series of major policy decisions aimed at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ve been formulated, clearly stating tha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primary task in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modernized country. Against this strategic backdrop,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tegrating digitalization and inclusiveness i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upported by 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ies, can effectively meet the demands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undertake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how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foster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in Shaanxi Province, while maximizing its inclusive and precision, as this holds immense importance in propelling

the province towards a higher standard of development.

By meticulously analyzing the existing scholarly work,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distinct attributes and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Utiliz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at elucidate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enhanced economic progress, it undertakes entropy and normalization procedures on the indic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measure pertinent to Shaanxi Province. By developing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this study meticulousl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the overall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and its three primary dimensions (coverage breadth, developmental depth, and digitization level) on the advanced economic progress of Shaanxi Province. It delves into the rol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its impact effectiveness is corroborated through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significantly foster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haanxi Province, with more pronounced effects in areas of slower economic growth and higher fiscal expenditure. Notably, in the Shaanxi Southern region compared to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Shaanxi area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even more distinct.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has shown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es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in Shaanxi through fostering innovation input and network development among other pathways. Drawing on these insight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set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imed at enh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ort,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strengthening risk prevention measures, all intended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beyond, through divers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Key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ntropy method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文献综述.....	2
1.2.1 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	2
1.2.2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4
1.2.3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5
1.2.4 文献评述.....	6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7
1.3.1 研究内容.....	7
1.3.2 研究方法.....	9
1.4 创新点与不足.....	9
1.4.1 创新点.....	9
1.4.2 不足之处.....	10
2 理论基础与影响机理	11
2.1 相关概念.....	11
2.1.1 数字普惠金融.....	11
2.1.2 经济高质量发展.....	12
2.2 相关理论概述.....	13
2.2.1 金融排斥理论.....	13
2.2.2 金融发展理论.....	14
2.2.3 包容性经济增长理论.....	15
2.2.4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16
2.3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	16
3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分析	19
3.1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测度.....	19
3.2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分析.....	20
3.2.1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趋势分析.....	20
3.2.2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区域比较分析.....	23
3.3 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	26
3.3.1 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	26
3.3.2 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测度.....	28
3.4 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分析.....	30
3.4.1 陕西总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30
3.4.2 陕西十个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测算结果.....	31
4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33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33
4.2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33
4.3 描述性统计	34
4.4 相关性分析	35
4.5 实证结果分析	36
4.5.1 回归结果	36
4.5.2 拓展性检验	37
4.5.3 稳健性检验	39
4.5.4 异质性检验	44
4.5.5 影响机理检验	47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0
5.1 研究结论	50
5.2 对策建议	51
5.2.1 优化顶层设计，增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性	51
5.2.2 强化技术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纵深发展	52
5.2.3 制定差别化战略，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	53
5.2.4 强化风险防范，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	54
参考文献	55
致谢	60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我国正处于全面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也正经历着关键的发展期。作为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经济的高质量成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金融力量。目前，我国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服务的普及度、易用性和用户满意度均有大幅提升。尽管如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旧面临许多挑战，与成为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在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全民共富是核心目标之一，数字普惠金融的进步为这一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持续改善小微企业、个体户、农户及新型农业主体的融资环境，并且积极拓展面向老年人、农民、新城镇居民、低收入人群、残疾人等特定群体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然而，就目前实际情况来讲，传统金融服务常常面临着很多种难题，例如融资难、信息不对称和渠道不畅等，这些问题使得以前得不到融资的中小企业和贷不到款的边远地区居民的金融需求得不到该有的金融服务，使得其根本性问题客户群体范围没有改变。因此，关键在于提升金融服务的目标、范围、客户群体等问题，从而提升实体经济的能力，把能推动实体经济质量和效率能力的群体服务好，才能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稳步增长。

为了解决传统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倾向于服务富裕群体而忽视贫困人群的问题，提升金融服务的普及和包容性，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加强对各类人群的金融支援。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目标。此后，政府各级和金融机构增加了对普惠金融的扶持，推行了众多政策和措施，比如创建普惠金融特别资金、成立专门的普惠金融服务机构等。到2015年底，国家对普惠金融发展做出了详细规划。该规划强调普惠金融应遵循机会均等和商业持续性原则，为所有需要金融服务的人群提供适宜、高效的服务，并推进金融服务平等化与普遍化，促使普惠金融持续发展。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中国正逐渐消除金融服务中的障碍，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公平性，推动金融

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和高质量增长，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持续的金融环境。

根据《“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日益凸显，预计到2025年，其在GDP中的占比将达到10%。这表明，发展数字经济和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潜能是加速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关键路径。通过对陕西省过去十一年的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发现了如区域发展不均、财政投资体系不完善和经济结构调整缓慢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结合陕西省政府发布的《关于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及通过哪些途径影响陕西的经济高质量增长，这对于提升陕西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层次有着重要意义。

1.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数字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时间相对较短，当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探讨其对居民消费行为、企业创新活动、城乡一体化以及乡村振兴策略等方面的作用。近两年来，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研究虽逐渐增多，但大部分研究仍旧依赖于省级数据来分析其对全国经济的贡献，较少关注地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具体影响。考虑到中国各省份发展水平和特点的差异，全国层面的发展策略并不总是适用于所有省份。因此，本研究旨在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并基于此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和建议。这不仅拓宽了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关系研究的范围，也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贡献了新的见解。

现实意义：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数字普惠金融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推动角色。本研究选取陕西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充分的数据分析，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为陕西省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旨在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研究结论明确指出，陕西省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这一结论也为其他省份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1.2 文献综述

1.2.1 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起源于小额信贷，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小额信贷逐渐演变为微型

金融，最终发展成为普惠金融这一更加广泛的概念，最终通过金融科技的加速，快速转变为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进一步演化，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继承了普惠金融旨在广泛服务的核心理念，而且在服务范围、深度及数字化水平方面实现了显著扩展和深化，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它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

在 2005 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这一概念，鼓励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改革金融体系，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以使不同社会阶层能够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从那时起，普惠金融的发展逐渐受到全球的关注。Valenzuela（2002）的研究表明，传统金融机构在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业务方面具有优势，这是因为它们拥有庞大的网络和丰富的支付经验。Claessens（2004）定义普惠金融为以合理成本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行性。国际学者如 Shahrokhi（2008）视数字普惠金融为一种创新的金融模式，它依托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提供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谢平和邹传伟（2012）将互联网金融视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一个代表，它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模式”，通过改进信息处理、支付方式和资源配置，提升社会效益，实现更高效、便捷和包容的金融服务。Anzoategui（2014）等学者探讨了汇款对萨尔瓦多金融包容性的影响，发现汇款显著提高了这些家庭开设银行账户和使用其他金融服务的概率。研究表明，汇款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了家庭，还在促进金融包容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吴晓求（2015）不仅确认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特性，还阐述了其运行逻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应用，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为个体和企业提供更灵活、便利、安全和高效的金融解决方案。其创新之处在于利用技术手段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达性和可负担性，推动了金融行业和金融体系的发展。总的来说，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形态，以其创新性和普及性获得广泛关注，为更多人提供了平等、便捷的金融服务，为金融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

在 2016 年，G20 峰会期间，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首次在全球伙伴金融包容性合作伙伴组织（GPFII）的白皮书中得到正式定义，随即引发了学界对数字普惠金融研究的高度兴趣。王晓（2016）针对该年度 G20 峰会背景，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新模式普及引发的金融风险，回顾了国际金融机构就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监管制定的规则，为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参考。Allen（2016）等学者分析了全球范围内个人和家庭对正式金融账户的拥有和使用情况。研究发现，收入、教育、性别和地理位置是影响金融包容性的主要因素，政策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改进可以显著提高金融服务的普及率，促进经济发展和减贫。胡滨（2016）提出数字普惠金融面临的三大挑战，包括监管体系与金融混业经

营的不匹配、法规滞后及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之间的矛盾。孔祖根（2016）等通过研究丽水农村金融改革的案例，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减轻了农村地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了农村信用体系和产业发展。宋晓玲（2017）的省级数据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Christopher、Himmelstein（2018）等人研究发现，高额医疗费用加剧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造成沉重负担，凸显了控制医疗成本和制定公平医疗政策的重要性。易行健（2018）等基于家庭数据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减轻居民的资金流动性压力和增强支付便捷性在推动消费增长上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负债率较低的家庭来说，其效果更为突出。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它在经济增长、创新能力提升及减贫效应方面的作用逐渐被认可。郭峰、白志红（2020）等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扩大了金融服务的普及和覆盖面。杨刚（2022）等人的创新能力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在区域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这种促进效应更加显著。刘雅欣（2023）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显著提高了就业质量。叶文辉和龚灵枝（2023）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包容性经济增长，并强调了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重要性。

1.2.2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在 2017 年的党的十九大上，高质量发展被首次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从追求速度的增长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这一转变强调了未来发展的核心在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激发经济增长潜力，并致力于构建一个多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明确了国家发展的未来路径。随着对高质量发展概念的深入研究，学术界对其内涵、特点及实现途径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形成了多元化的理解。任保平（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内涵更丰富、要求更高的发展范式，强调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生态文明的现代社会，把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首要动力。进一步的研究中，刘志彪（2018）提出了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综合方案，涵盖实施均衡发展战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以及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多个层面。李旭辉和朱启贵（2018）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建立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魏敏和李书昊（2018 年）从五个方面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套全面系统的指标体系。两位学者的研究共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度量与评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

践指导。

在构建和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多位学者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詹新宇和崔培培（2016）以新发展理念的五大数据为基础，应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综合指数。李书昊（2018）针对国内实际情况，基于新发展理念进行了细分，提出了包括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在内的十个维度，分析了不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张震和刘雪梦（2019）考虑到新常态下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构了包含经济动力和新型产业结构在内的7个层面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并对副省级城市进行了评价。马茹等（2019）从供给、需求、发展效率等五个层面刻画高质量发展水平，揭示了地区之间在这些维度上的优势。史丹和李鹏（2019），以及刘亚雪（2020）等在新发展理念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评价指标体系。吴志军和梁晴（2020），余东华（2020）分别从综合质效和制造业发展角度加入新的维度。徐亚平、潘韵婷和史依铭（2023）运用熵值法，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精心构建了包含13个基础指标的评估体系，对中国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测量与评估。Ma T.（2023）等学者通过熵值法构建了评价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分析了2000—2020年期间西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区域差异显著。Wang X（2023）通过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如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研究表明，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缓环境污染。殷培伟、谢攀和雷宏振（2023）研究发现，中国国家中心城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提出应根据各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差异化政策。

1.2.3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近年来新兴并被广泛探讨的理念，尤其是后者更具有中国的特色，因此相对较少受到国外学界的关注，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较多研究。郭华（2020）等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通过数字支付、信贷和保险等方式提高便利性，降低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促进了农业就业结构的转型和收入结构的优化，从而增加了农村消费性信贷的需求。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见解，如张勋（2020）指出，尽管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但对提升消费并没有显著效果。赵晓鸽（2021）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金融资源的错配，特别是对城市创新有积极影响，且在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效果更明显。聂秀华等（2021）、郭

沛瑶和尹志超（2022）发现，在金融发展成熟、制度质量好、人力资本水平高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加显著。傅利福（2021）和刘伟（2021）等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激励作用，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国际贸易、财政支出、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和居民消费等多个中介因素发挥作用。Su R、Zheng T、Zhong Y（2023）等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指出数字金融普惠通过提高创新能力、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风险承受能力，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Mo Y、Mu J、Wang H（2023）等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利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主要通过增加劳动就业和提高农民收入来实现。

近年，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成学术热点，学者们多用实证分析深究其影响机制与效果。程云洁与段鑫（2022）借助空间统计分析工具，深入剖析了2011至2018年间中部城市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该区域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贡献。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中部城市的经济质量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且这种效应在不同地区间呈现出差异性。进一步的研究揭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激发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活力，有效推动了中部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样地，王刚贞与陈梦洁（2022）利用中国各省市的丰富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国内经济高质量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他们的研究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时间和地域差异性，为各地制定针对性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国际贸易作为中介变量，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王年咏、张珂和张目（2023）研究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升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生产效率，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和推动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2.4 文献评述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日益重要，但国外学者对此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相比之下，国内研究更为丰富，近年来更是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热点话题。自2005年联合国首次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特别是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快速演进，不仅继承了普惠金融广泛服务社会各层的核心价值，还通过数字化手段大幅拓展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提高了其影响力。国内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及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发现它不仅在总体上对经济高质量

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不同维度上表现不一，涉及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等多个方面，其影响具有时空异质性。

这些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减少金融资源错配、推动城市创新及激励企业家创新创业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也指出了制度质量、人力资本水平对其效果的重要影响。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政策制定和监管环境优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考虑到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系统搜集和整理了陕西省各市的相关资料，深入分析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及差异。基于此，构建科学评价体系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丰富该领域研究。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第一章，绪论。本章首先从目前我国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性，深入阐释了研究的宏观背景与深远意义，即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普惠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愈发凸显，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迫切需要数字普惠金融的有力支撑；其次，对数字普惠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等相关文献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归纳。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深入分析，旨在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最后，阐述了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并对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作出说明。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影响机理。首先，结合已有研究，对数字普惠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对本文研究的基础理论进行总结归纳；最后，基于理论深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揭示了其影响的内在逻辑。

第三章，陕西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分析。首先，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测度构建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深入探讨了陕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通过从数字普惠金融的综合发展水平以及三个次要维度进行全面分析，揭示了陕西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态势。进一步地，将陕西省十个地级市逐个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在陕西省内不同地区间的异质性表现。其次，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核心指引，精心构建了涵盖产业结构、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创新、居民生活以及生态环

境五大维度的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这一科学测算方法，得出了2011-2021年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后，结合前述测算结果，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第四章，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的，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发展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并经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疫情期间(2020—2021年)数据、考虑滞后效应、倾向值匹配得分法(PSM)，这四种稳健性检验确认了结论的可靠性。同时，我们还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创新投入和网络发展来促进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第五章，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在深入分析实证研究结果的同时，紧密结合陕西省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优化建议。这些建议旨在推动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进一步深化，并促进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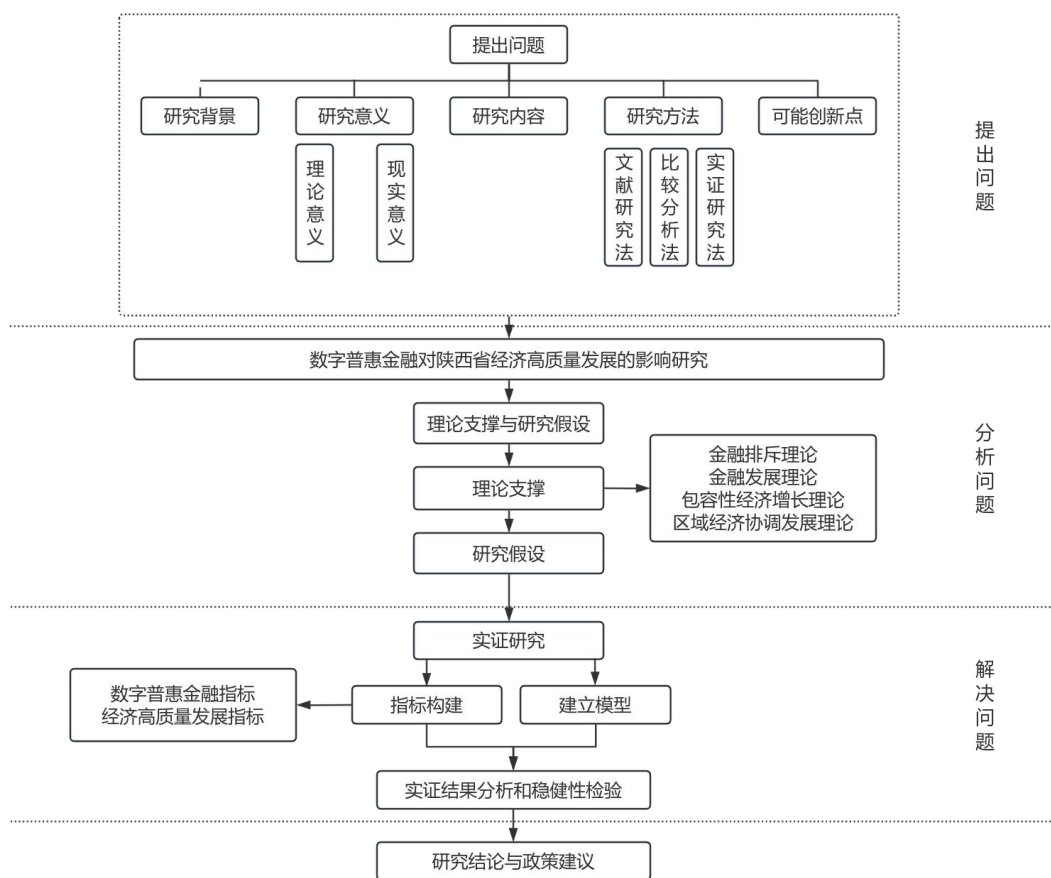


图 1.1 技术路线图

1.3.2 研究方法

(1) 文献归纳法。

本研究通过采用文献综述法，对国内外有关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了广泛的收集、整理与分析。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归纳总结，本文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概念、关键指标的构建方法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具体机制和模型建立等多个方面。应用文献综述法使我们能系统整合现有的研究发现，对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理解，这不仅丰富了我们两者关系的认识，也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和政策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

(2) 比较分析法。

本研究采用比较分析方法，深入比较了陕西省内 10 个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以期全面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揭示了这些城市在两个指标上的显著差异，指出了城市间发展的不均衡性。此外，分析也表明，随着科技革新的推进，这些区域间的差异性也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和优化趋势。

(3) 实证分析法。

通过采用实证分析法，本研究借助简单面板回归、中介效应回归模型，对 2011 年至 2021 年陕西省内 10 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专注于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该省经济高质量成长的实际影响。通过对陕西省不同地区的深入研究，本文确立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这一方法论的应用不仅增强了研究的信度，而且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增长之间的正向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持，有助于陕西省紧跟国家发展的步伐，坚持走高质量发展路线。

1.4 创新点与不足

1.4.1 创新点

通过系统地回顾和梳理相关文献，本文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实现经济援助等方面，而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大多从国家宏观视角出发，对数字普惠金

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缺乏针对特定区域的深入研究。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选取了陕西省的 10 个市作为研究样本，并利用近 11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详细分析。采用熵权法，本文对陕西省整体以及各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全面测算。同时，结合陕西省的实际经济状况，本文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从而丰富了该领域的区域性研究。

1.4.2 不足之处

尽管本研究已力求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但仍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首先，本文所依赖的主要解释变量——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数据源仅限于蚂蚁金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评估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为了更准确地衡量一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未来研究应考虑纳入更多来源的数据。其次，本研究实证分析的时间跨度为 2011 年至 2021 年，相对较短，而且样本数量相对较少。因此，从长期来看，本研究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考察仍不足。未来研究可通过延长样本数据时间，进一步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

2 理论基础与影响机理

2.1 相关概念

2.1.1 数字普惠金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数字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普惠金融模式经历了创新和变革，进而演化为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业态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和发展潜力，使得传统金融体系开始适应时代趋势，向数字化转型。根据 2016 年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GPII）所发布的白皮书，数字普惠金融以其独特的创新性、共享促进性以及成本降低性等特点，巧妙地利用数字技术为广大人群提供了全面而便捷的金融服务。通过这种方式，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展现了其在金融领域的深远影响力，更为全球金融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 2016 年担任 G20 主席国期间，中国提出了《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该提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分析报告》，数字普惠金融被定义为在成本可控且模式可持续的情况下，依托多种数字技术，为社会各层次人群，尤其是那些传统金融服务尚未充分覆盖的低收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边远地区居民以及小微企业等特定群体，提供公平、有效、全面和便捷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在中国，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呈现多元化态势，涵盖了各类金融和类金融机构。普惠金融的核心宗旨是确保所有人都能在可承受的成本内获得金融服务，其运营基于商业原则，与政府的贫困救助计划不同。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现代技术如移动互联网、网络通信、移动数据与云计算等，目标是为那些原本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人群提供长期的、多元化的金融服务。这些服务由金融及类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手段提供，涵盖存款、支付、贷款、保险和投资管理等领域。这些金融服务是收费的，旨在满足用户需求，同时确保在用户能够承担的成本和服务提供者能够维持的价格水平上进行。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涉及传统金融机构对现有产品进行的数字化改造，也包含新兴类金融机构，如互联网金融公司提供的创新金融产品。

提出这些定义与原则体现了数字普惠金融核心理念：利用数字技术突破传统金融服务的地理和时间界限，使广泛的人群能够接触到合适的金融服务。目标是通过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便利性，保障金融服务的普遍可得，从而支持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这种趋势对于提升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助力小微企业成长以及保证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健和兴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坚信数字普惠金融是在普惠金融的坚实基础上，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打破了金融服务在时空上的束缚。通过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和运营成本，数字普惠金融得以汇聚广大未被充分服务的群体，并为他们提供多样化、正规化的金融服务。这一金融创新活动不仅拓宽了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还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接触率，为更多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福祉。

2.1.2 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构成了习近平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自党的十八大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强调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从高速增长过渡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一转变不仅在理论层面深化了对高质量发展的认识，丰富了其含义，也在实践层面通过制订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战略措施，促进了地区和行业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迈进。

自党的十九大将高质量发展确立为重要目标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涵盖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解析、发展水平评估以及理论创新等多个领域。在解读内涵方面，研究涉及发展阶段、模式和特性的转变；有观点认为，高质量发展代表着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型，反映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融合；还有学者通过探讨质量、效率和创新等维度来诠释高质量发展；也有观点认为，面对现实问题和发展瓶颈，迈向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增长到达一定阶段的自然体现。在衡量发展水平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包括从供给侧评估生产水平、从经济增长质量角度探讨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从社会发展的高效、公平和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测量；一些研究甚至借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情况的测度模型来评价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进程；还有研究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了综合的测度体系。在理论创新方面，有学者指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扩充了劳动价值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构建以质量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宏观和微观理论支撑。随研究的不断深化，高质量发展成为不同行业、领域乃至各地区、城市研究的焦点，涌现了大量关于理论框架、实践路径和指标系统的丰富研究成果。

2022年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再度将加速形成新发展格局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上日程，进一步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该报告突出了致力于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性和重大

意义，认为这不仅是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基本需求，也是实现中国经济跃升的关键路径。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质量和效益的同步提升，同时强调必须优化经济架构并推进结构性改革，旨在促进产业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改善资源分配，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并确保生态环境的持续保护。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程显示，其目标是促进经济的质的提升。这一理念超越了简单追求经济规模增长的视角，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和持续性。为达到此目标，创新驱动、结构调整、资源的高效利用、环境的绿色发展以及全方位对外开放成为关键路径。因此，高质量发展被视为一种经济进步的方式、构成和驱动力，旨在更全面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2.2 相关理论概述

2.2.1 金融排斥理论

尽管“金融排斥”这一术语已被学术界广泛引用，关于其确切含义，学术圈仍未达成一致或权威性的解释。1993年，英国的Leyshon最早将“金融排斥”定义为“阻止贫困人群和边缘化群体接入标准（主流）金融系统的过程”，这被认为是“金融排斥”最早的学术描述。由于Leyshon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金融的地理分布，他的定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然而，这个观点仍广受学术界的接受。其他学者，如Kempson和Whyley，则从金融消费者的视角深入探讨了金融排斥的内涵。在他们看来，金融排斥不仅表现为对活期账户、抵押贷款等传统金融产品的匮乏，还涉及储蓄、投资以及保险等更广泛的金融服务领域。而在中国，一些学者对金融排斥的定义则更为具体和深入。他们认为，金融排斥是指那些因处于弱势地位而无法以可承受的成本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获得公正、安全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潜在用户。这些用户由于面临服务短缺的困境，不得不转向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替代性金融渠道。这种定义不仅揭示了金融排斥的本质，也凸显了解决金融排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许多学者在讨论“金融排斥”时，往往偏向于认为这是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的排斥行为。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随着新型金融业态的出现、金融行业竞争的加剧以及非中介金融和直接融资的兴起，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主导地位已经受到挑战，特别是在一些区域、特定业务和客户群体中，金融服务的过剩供给使得一些金融机构面临生存的压力。因此，“金融排斥”应视为一个不断演化的概念，它的复杂性使得简单化的定义

更具适应性和普遍性，以应对不同时间和空间背景下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金融排斥”可被简化定义为金融供需双方之间的不匹配关系，并且这种不匹配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金融服务的提供方与需求方不匹配；其次是需求方对提供方的排斥；最后是供需双方相互排斥的情况。

金融的发展和作为经济增长媒介的作用已被认为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缺少有效的融资渠道会导致经济增长势头放缓。金融进步、经济扩张以及跨代收入变化的动态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为了确保经济增长的收益能够广泛分配，经济增长必须具备包容性，否则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影响。尽管难以量化金融排斥的全面影响，金融排斥作为社会排斥的一部分，带来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后果，比如加深贫困和加剧收入不平等；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恶化，如 Pulido 指出，金融不公可能恶化贫困人口和少数族裔的居住条件，增加他们遭受污染和不合理土地使用的风险；还可能扩大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因此，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来减轻金融排斥现象，比如通过制定法律或建立专业组织来缓解金融排斥；加强基于社区的微型金融服务以减少“接触障碍”；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升收入水平和加强教育来减少“使用障碍”。

2.2.2 金融发展理论

格利和肖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作品中，为金融发展理论构建了坚实的框架，他们不仅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探讨了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深入到了金融体系的内部，分析了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以及金融市场如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他们的研究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也为发展中国家制定金融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格利和肖的研究基础上，麦金农和肖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们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稳定汇率或实现其他宏观经济目标，常常对金融市场进行过度的干预，导致金融市场无法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这种干预往往表现为对利率的严格控制，使得利率无法真实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从而降低了储蓄率，减缓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同时，由于政府对信贷市场的干预，使得资金往往流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或政府项目，而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中小微企业却难以获得资金支持。这种金融抑制现象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还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为了消除金融抑制，麦金农和肖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逐步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让市场力量来决定利率和资金的流向。通过金融深化，

可以提高储蓄率，加速资本积累，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金融深化还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经济的整体竞争力。然而，要实现金融深化并不容易。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制度等多种原因，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已经根深蒂固。此外，金融结构的单一性也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了推动金融深化，发展中国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包括完善金融法规、加强金融监管、培育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提高金融服务的普及率和质量等。

总的来说，格利和肖以及麦金农和肖的研究为发展中国家理解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他们的观点不仅揭示了金融抑制的危害和金融深化的必要性，也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金融改革战略提供了有益的指导。然而，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都有所不同，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借鉴这些理论时，还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应用。

2.2.3 包容性经济增长理论

持续的贫困问题无疑对人类社会进步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和挑战，因此，这一问题自然引起了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全球各国的共同关注和努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是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核心议题来加以推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术界也开始积极探索新的解决路径。其中，“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无疑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方向。所谓“包容性增长”，强调的是一种更加全面、均衡、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它要求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总量的提升，更要关注分配的公平与合理，确保所有人都能分享到发展带来的红利。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加和谐、繁荣的未来。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人与环境的共同繁盛，此概念也被称作共享增长。中国学者林毅夫于 2004 年在亚洲开发银行举办的“杰出学者演讲”中发表讲话，主题为“为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寻求惠及全民的增长模式”的发展策略，他建议亚洲发展中国家应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实施包容性增长策略，以此来减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在于使发展的机遇与成果惠及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包括贫困群体、边缘化社群、乡村居民及少数民族等在内。其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降低贫困与不公现象，保障每位社会成员均能享有经济进步带来的益处，共同分享发展的果实。具体而言，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涉及多个层面：使更广泛的人群受益于全球化的经济效益、增强经济较

弱地区的社会保障网络、提高经济边缘群体的自我提升机会和能力，以及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快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转变期。促进包容性增长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策略的核心。通过增强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教育质量、推进地区间发展的均衡、强化社会正义与法制建设，以及关注持续发展的理念，中国旨在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的和谐统一，确保所有人能享受到经济成长带来的福祉，共同步入一个更加繁盛与持久的将来。为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排除影响经济成果共享的各种障碍，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愿景。

2.2.4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起，我国学术圈首次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概念，旨在应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对于何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前尚缺乏一个广泛认同的科学定义。简而言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的是各地区之间经济往来的加密、相互依存的加深以及发展的互动增强，旨在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与持续增长。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减少地区间发展差异的扩大，促进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同时维持和加强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包括，使不发达地区成为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并通过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提供技术、资金、项目等方面的支援，促使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进步，进而减小地区间发展的悬殊，建立健康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增强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因此，协调发展的理论主旨在于缓解区域间经济增长的不均衡现象，其核心包括平衡与不平衡发展两个关键概念。平衡发展强调市场作用与资源自由流动的重要性，不平衡发展则侧重于政府的介入和策略性调控的作用。通过将这两种理念相结合，并根据具体状况拟定合适的政策，有助于推动地区间经济的和谐增长，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整体的共荣。

2.3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

总体来说，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促进资金的高效配置和利用，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可以通过以下三个假设进行阐述：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使金融服务更加广泛和便捷，覆盖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覆盖的群体，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提高效率和可及性。具体来说，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资本利用效率，使更多企业和个人能够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促进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活跃和创新创业。传统金融服务由于高成本和高风险，往往难以覆盖到中小企业、农户和低收入群体，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能够更精准地评估这些群体的信用风险，提供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融资效率。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模式，能够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推动经济活动的活跃和多样化。同时，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便捷的支付和信贷服务，提升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促进消费增长。数字支付的普及使得交易更加便捷，信用体系的完善也使得消费信贷更加普及，提升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进一步拉动了内需。此外，数字普惠金融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渠道，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数字平台，投资者可以更便捷地获取投资信息，参与到各类投资活动中，提升资本市场的活跃度和效率。

基于这些作用机制，本文提出假设 1：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经济发展较慢和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需求更为迫切且更具潜力。在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金融服务相对匮乏，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加突出，这些地区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因缺乏抵押物和信用记录难以获得传统金融机构的支持。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手段，能够更好地评估这些主体的信用风险，提供更加灵活和便捷的金融服务，降低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这些地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数字普惠金融在这些地区的效果更为显著，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经济活动，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在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通常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如互联网和通信网络，这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使金融服务能够更高效地传递和应用。同时，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较高，教育和培训体系较为完善，提升了居民和企业的金融素养和接受度，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经济活力较强的地区市场需求旺盛，企业和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更大，数字普惠金融在这些地区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特别是陕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支持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多元化，促进经济活力和多样化发展。陕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和经济环境，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数字普惠金融在该地区的效果更为显著。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展较慢、财政支出较高和陕南地区更显著。

创新和网络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创新投入包括研发投入、技术开发和应用等，能够提升企业和地区的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降低创新成本，激励更多企业和个人参与创新活动。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平台，企业和个人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得融资支持，用于研发投入和技术开发，从而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网络发展的重要性在于其作为数字经济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能够提升信息流通效率，促进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依托网络技术，通过提供融资支持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覆盖面，使得更多的企业和个人能够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此外，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金融服务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风险，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进一步促进了创新活动的发展。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推动创新投入、网络发展，进而促进陕西省高质量发展。

3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分析

3.1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测度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的研究团队从 2016 年开始利用蚂蚁集团的大量数据，编制了一套名为“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指标体系。该指数基于现有文献和国际组织提出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标，结合数字金融服务的新形势、新特征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如图所示：

表 3.1 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指标	
覆盖广度	账户覆盖率	每万人拥有支付宝账号数量	
		支付宝绑卡用户比例	
		平均每个支付宝账号绑定银行卡数	
	支付业务	人均支付笔数	
		人均支付金额	
		高频度（年活跃 50 次及以上）活跃用户数占年活跃 1 次及以上比	
使用深度	货币基金业务	人均购买余额宝笔数	
		人均购买余额宝金额	
	信贷服务	每万支付宝用户购买余额宝的人数	
		每万支付宝成年用户中有互联网消费贷的用户数	
		个人消费贷	人均贷款笔数
		人均贷款金额	
小微经营者	每万支付宝成年用户中有互联网小微经营贷的用户数		
	人均保险笔数		
		人均保险金额	

续表 3.1 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指标
数字化程度	保险业务	每万支付宝用户中被保险用户数
		人均保险笔数
		人均保险金额
	投资业务	每万人支付宝用户中参与互联网投资理财人数
		人均投资笔数
		人均投资金额
	信用业务	自然人信用人均调用次数
		每万支付宝用户中使用基于信用的服务用户数(包括金融、住宿、出行、社交等)
	移动化	移动支付笔数占比
		移动支付金额占比
	实惠化	小微经营者平均贷款利率
		个人平均贷款利率
	信用化	花呗支付笔数占比
		花呗支付金额占比
信用化	芝麻信用免押笔数占比(较全部需要押金情形)	
	芝麻信用免押金额占比(较全部需要押金情形)	
便利化	用户二维码支付的笔数占比	
	用户二维码支付的金额占比	

资料来源：北大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

3.2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分析

3.2.1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趋势分析

(1) 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

由图 3.1 可知,陕西省的数字普惠金融从 2011 年到 2021 年展现了显著的增长趋势。2011 年,该省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 40.96,到了 2021 年跃升至 374,约增长了 9 倍,年均增长率达到 26.37%。这一显著增长得益于陕西省政府自 2016 年以来对数字普惠金

融实施的一系列创新政策和深化改革，尤其是发布的《陕西省“十四五”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大力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扩展，特别是在支持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方面，有效改善了农村经济条件，提高了农民收入。观察年增长率，2012年增长率达到顶峰139.84%，显示出起步阶段的爆发增长。2013至2015年增长速度虽然放慢，但仍保持在20%以上，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逐渐趋于稳定。2016年，随着《陕西省“十三五”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发布，金融发展由速度转向质量，增长率略有下调至6.13%。2017年增长率回升至16.34%，显示“十三五”规划的效果开始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增长得到推动。2018年和2019年增长率稳定在10%左右，标志着从快速增长到稳定增长转变。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增长速度略有减缓，但增长率仍保持在5%以上，反映出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稳健性。2021年，尽管面临多重挑战，但依旧实现了约4个百分点的增长，显示出陕西省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中取得的均衡，为“十四五”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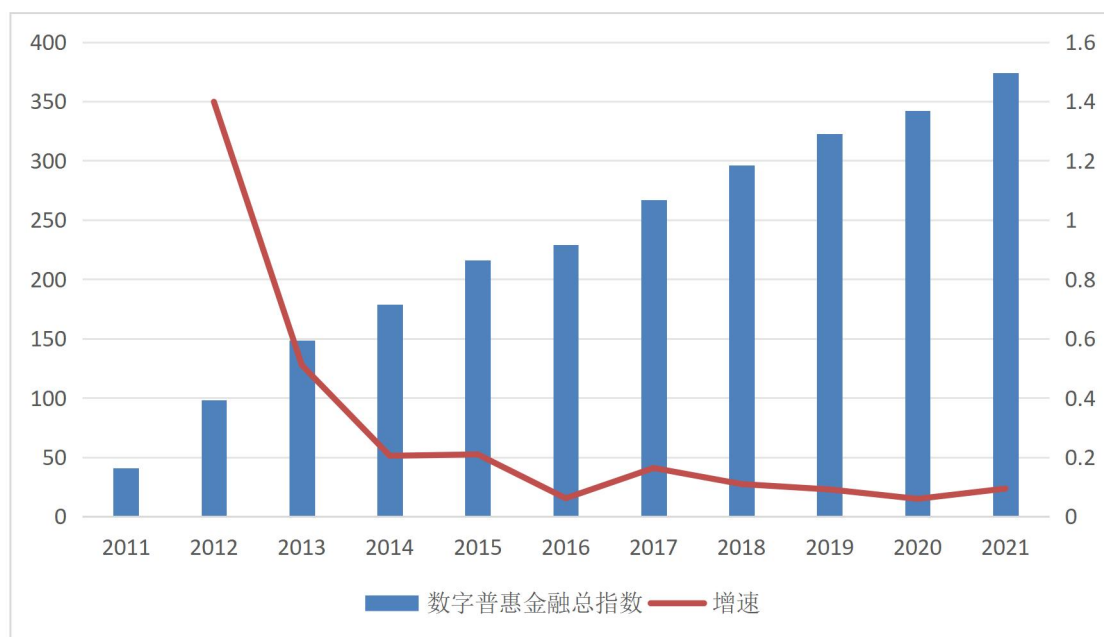


图 3.1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增速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1）》整理所得

（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维度分析

由图 3.2 分析可知，从 2011 年至 2021 年，陕西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在覆盖范围、使用频率及数字化水平方面均展现出积极的增长态势。其中，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最为显著，而覆盖范围和使用频率的增长在某些年份相差无几，整体趋势均向好。观察覆盖范围，

2011 年的 37.81 增至 2021 年的 364.12，增幅达到约 9.6 倍，显示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率显著提升，实现了显著的进步。在使用频率方面，2011 至 2013 年增长迅猛，但 2014 年受社会融资规模收紧影响稍微回落。2015 至 2017 年再次加速增长，而 2018 至 2021 年增长速度略有放缓，2021 年达到历史高点 371.22，反映了金融服务下沉的不断加强。就数字化水平而言，2011 至 2015 年初期增长迅速，2016 至 2017 年受金融政策调整和监管加强影响稍有下滑。2018 至 2021 年，得益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电商平台的兴起，数字化水平得到恢复，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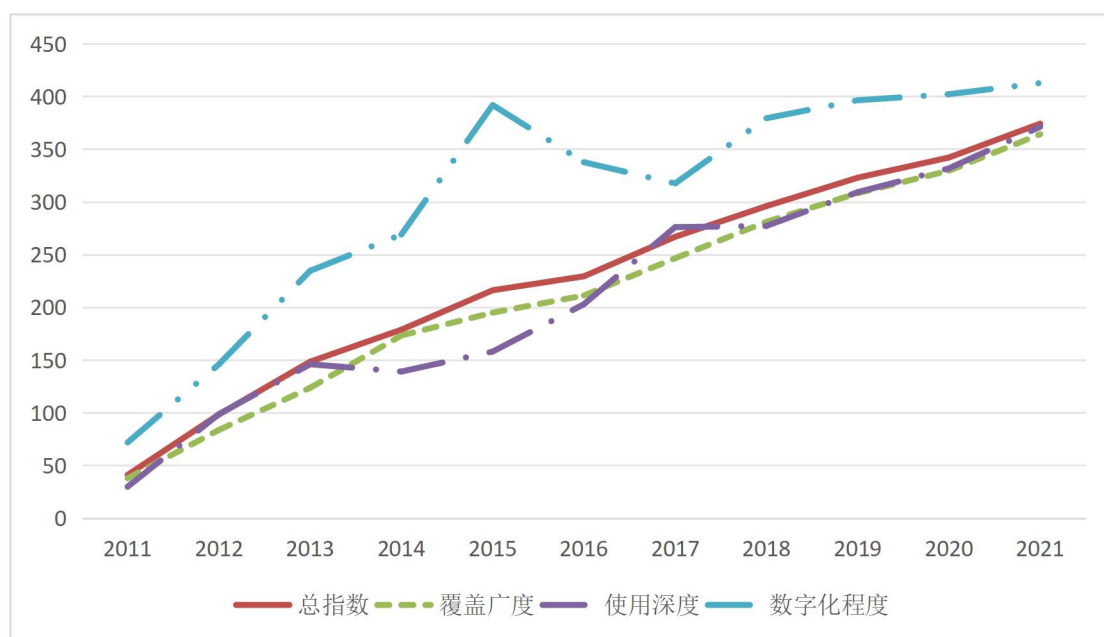


图 3.2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各分指数

(3)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分析

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的分析，评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指标涵盖了支付、信贷和保险等金融服务的水平。随着数字化支付、网络化的小微企业融资、数字小额理财和在线小额保险等新模式的兴起，陕西省也在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以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进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优质增长。基于 2011 年至 2021 年的数据，支付领域的数字化服务逐年扩增，从 2011 年的 34.44 增长至 2021 年的 285.89，即便在 2020 年新冠疫情冲击下也保持了增长势头。信贷服务方面，2012 至 2014 年因宏观经济调整增长稍缓，但随着 2016 年陕西及国家层面推出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政策，2015 至 2021 年期间信贷服务持续增长，显示出稳定且向好的发展趋势。在保险服务领域，观察期间内保险业务经历了起伏波动，2011 至 2014 年为快速增长期，而 2015 年由于车险业

务减少和政策调整导致短暂下滑。2016 至 2019 年，随着保险销售门槛降低，保险业务恢复增长。但由于经济放缓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2020 至 2021 年保险业务再次面临下降压力。

3.2.2 陕西数字普惠金融区域比较分析

(1) 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比较分析

表 3.2 展现了 2011 至 2021 年陕西各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通过这段时间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陕西省内的 10 个市级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展现了增长的趋势，并在近年呈现快速发展，反映了国家经济的稳健前进和陕西省金融业的迅猛增长。其中在 2021 年，西安市以 317.65 的成绩领跑，展示了其在数字金融服务方面的先进地位。紧随其后的铜川市和宝鸡市也显示了稳定的发展势头，分别达到了 279.35 和 282.02 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咸阳市，其从 2011 年的 54.12 增长至 2021 年的 287.08，显著地展现了其发展的潜力与成果。同时，渭南市、延安市、汉中市、榆林市及安康市虽然增长速度较慢，但也稳步前进，其中渭南市从 2011 年的 37.49 提升至 2021 年的 273.31，延安市、汉中市、榆林市和安康市的发展也有所提升。商洛市虽在这段时间内增长较缓，但从 35.96 提高到 260.67 的成绩也证明了其在数字金融服务领域的持续进步。

表 3.2 2011-2021 陕西各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城市	西安市	铜川市	宝鸡市	咸阳市	渭南市	延安市	汉中市	榆林市	安康市	商洛市
2011	75.39	49.97	49.34	54.12	37.49	33.3	48.81	46.1	40.94	35.96
2015	202.95	161.16	167.66	166.95	153.84	159.19	162.78	162.43	155.87	145.11
2016	225.47	186.76	190.57	194.46	183.09	190.28	185.38	191.08	176.80	162.68
2017	250.45	208.30	214.08	215.58	205.31	212.46	209.17	212.59	205.12	195.18
2018	263.98	220.68	226.91	227.55	215.00	220.13	220.12	219.40	215.57	205.29
2019	280.75	232.92	238.36	240.37	227.16	231.78	232.40	232.75	227.76	216.08
2020	292.35	246.91	250.19	253.77	240.58	244.67	245.65	248.00	240.15	230.04
2021	317.65	279.35	282.02	287.08	273.31	276.28	274.12	278.06	270.97	260.67

资料来源：北大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

图 3.3 反映了 2011 至 2021 年间陕西省各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各市在该领域的发展态势。西安市以 214.21 的指数领先，显示了其作为省会城市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上的强劲动力和领先地位。接下来的铜川市、宝鸡市与咸阳市，其指数分别为 173.33、179.09 和 181.10，这反映了这些城市在数字金融服务方面的良

好发展势头，特别是咸阳市，接近西安市的表现凸显了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商洛市的指数平均值为 156.80，尽管在所有城市中最低，但依然反映出过去十年该市在数字金融服务领域的持续发展努力。总体而言，陕西省各市在过去十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展现了全省在这一领域的整体进步，尤其是西安市的显著成绩，突显了陕西省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的积极趋势和潜力。同时，省内各市之间在数字金融服务水平上的差异，意味着未来需要进一步努力以缩小这些差距，推动更加均衡和全面的金融服务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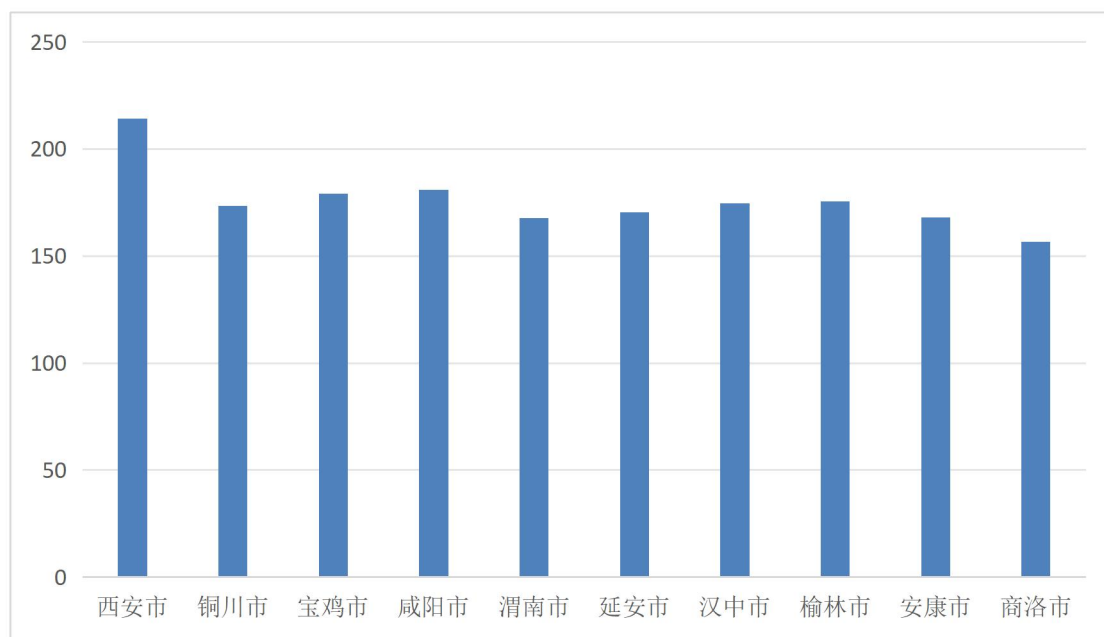


图 3.3 2011-2021 陕西省各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

(2) 各市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维度比较分析

图 3.4 反映了 2011 至 2021 年间，陕西省各市在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方面的年均增长速率。商洛市在覆盖广度方面以年均增速 38.20% 领先，显示其市场在逐步开拓中，尤其在经济较为欠发达的地区，覆盖广度还有较大的增长潜力。相比之下，西安市的增速仅为 14.09%，这可能意味着其市场接近饱和状态。

在使用深度方面，安康市以 38.79% 的年均增速最高，反映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物流条件的改善，经济相对较弱的地区仍有很大发展空间。而咸阳市的年均增速最低，仅为 18.68%，可能由于该市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已相对成熟。数字化程度的年均增速最高的是延安市，达到了惊人的 67.68%，从 2011 年的 3.64 提升至 2021 年的 298.20，显示该市正处于数字化快速发展阶段。相对而言，咸阳市的增速最低，为 14.99%，表明其数字化发展相对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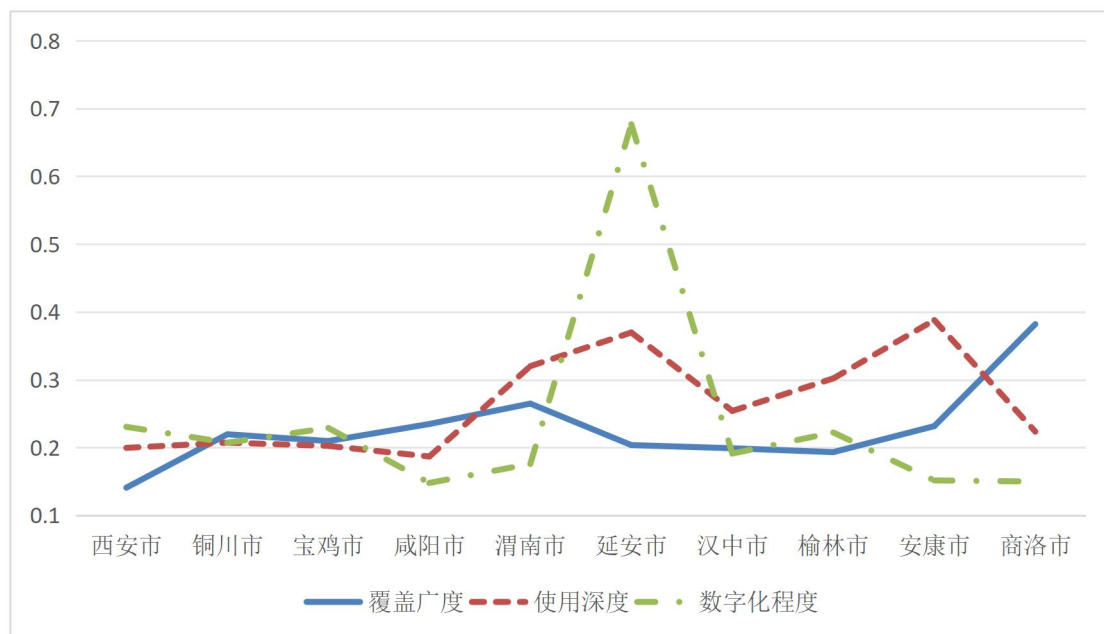


图 3.4 2011—2021 年陕西各市数字普惠金融分指标年均增速

从图 3.5 中可以看出，陕西省在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方面，西安市、榆林市和咸阳市位于榜首，分别达到了平均数 223.68、174.36 和 173.10，显示它们的服务网络相对更广泛。相对而言，商洛市的平均覆盖指数最低，仅为 140.812，这暗示了该市在未来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使用深度的评估中，西安市领先，而延安市以 148.65 的最低平均数显示出陕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深度的提升潜力。对于数字化水平，咸阳市、西安市和安康市表现突出，而商洛市、铜川市和汉中市则落后，表明关中地区的数字化服务水平相对较高，而陕南地区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这一分析不仅揭示了不同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差异，也为今后的策略调整提供了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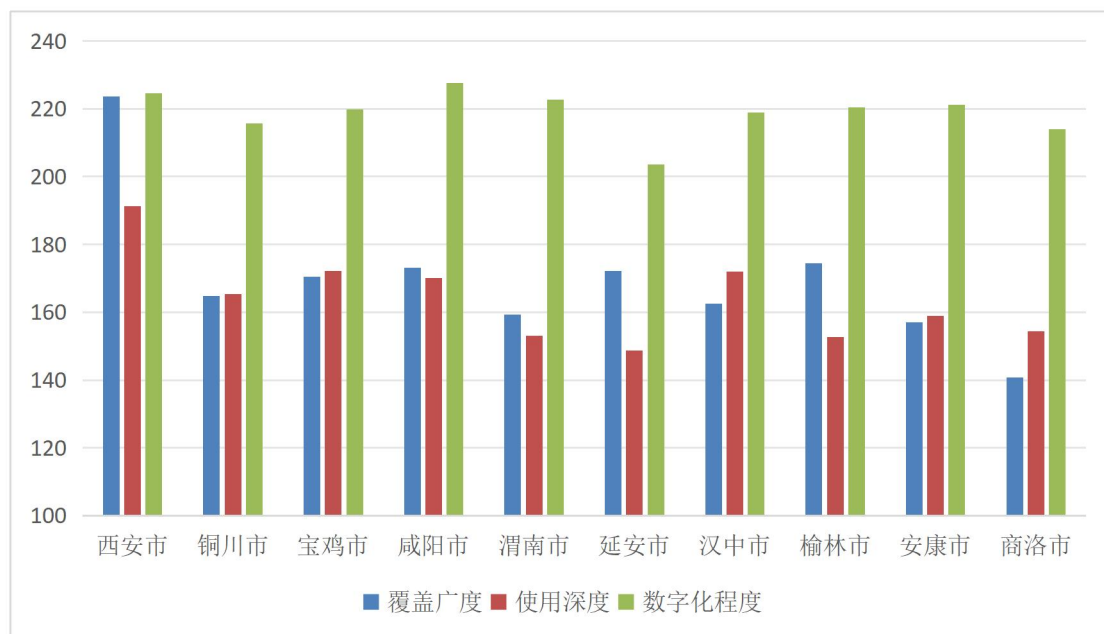


图 3.5 2011—2021 年陕西各市数字普惠金融分指标年均指数

3.3 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

3.3.1 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

本文依据赵涛、张志（2020）等人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多维度评价体系，涵盖产业结构、包容性 TFP、技术创新、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五大关键指标，以全面评估 2011—2021 年陕西省十个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具体见表 3.3。

（1）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它要求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制造业）与第三产业（服务业）之间达到协调发展的状态。在现代经济中，生产性服务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不仅支撑着科技创新，也推动产业变革。对产业结构的评估，通常聚焦于三个核心指标：产业的高级化程度、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产业的高级化可通过服务业与制造业产值之比来量化，这一比值反映了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其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常采用泰尔指数来评估，该指数基于三大产业间的就业人数和产值比重，反映了各产业之间的均衡程度。为了实用性，这一指数通常会转化为正值。在缺乏直接产值数据的情况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则可以通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该行业所占的比重来估算，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运输、信息传输、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通过这一综合性评估体系，能够洞察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和潜在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制定政策、推进结构

调整和促进经济转型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确保经济发展既高效又可持续。

(2) 包容性 TFP。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是经济增长是否能兼顾效率与公平，即展现包容性。本研究将资本和劳动视为基础投入，实际 GDP 为期望产出，同时引入城乡收入差距作为非期望产出，进而计算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利用 Hicks-Moorsteen 指数法，我们成功构建了包容性 TFP 指数，为评估共享成果的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视角，超越了传统的城乡收入比和基尼系数等单一指标。在数据处理环节，我们采用 9.6% 的折旧率，并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劳动力投入则是通过全面统计包括单位、私营和个体在内的全社会就业人数来确定。对于期望产出，我们使用以 1990 年为基期的实际 GDP，并根据各市的 GDP 平减指数进行适当调整。至于非期望产出的城乡收入差距，我们通过计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或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比例来衡量，并通过取倒数的方式，将其转化为一个更具直观性的正向指标。这一系列精细化处理，确保了我们的研究数据既准确又具可操作性。

(3)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是推动经济增长、提升产业竞争力、解决社会问题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然而，传统上仅依赖专利数量来评估城市创新能力的做法显得过于单一，难以全面反映真实情况。《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2017》则提出了一种更为综合的评估方法——城市创新指数。该方法深入考虑了有效发明专利的年龄分布特点，通过精确估算不同年龄段专利的平均价值，并结合城市层面的具体数据进行加权计算，从而得出更为全面、准确的城市创新指数。这一创新性的评估方法，不仅突破了传统评估的局限，也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

(4) 生态环境。构建生态文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和重要成果。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将推动绿色发展、降低污染排放置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为了有效衡量城市在环境治理上的投入与成效，我们采用了包括二氧化硫除率、工业固废利用率及 PM2.5 水平在内的环境质量二级指标体系。其中，二氧化硫除率的计算方式为（二氧化硫产生量—排放量）除以产生量。考虑到 2011 年数据统计口径的变化，我们特别对该年及其前后两年的二氧化硫除率数据进行了三年平均值处理，以确保数据的连续性和精确性。这一系列的细致处理，旨在更真实地反映城市在环境治理上的努力与成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5) 居民生活水平。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在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因此，在评估经济是否实现高质量发展时，必须将民众的实际感受放在

首位，关注他们是否真正受益于经济增长，他们的幸福感是否得到了实质性提升。除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指标外，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服务质量，同样对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产生深远影响。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了人均 GDP、人均教育投入以及人均医院床位数量作为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次级指标，并将这些指标有机融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估体系中。

表 3.3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高级化	+
	产业结构合理化	-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
包容性 TFP	包容性 TFP 指数	+
技术创新	创新指数	+
生态环境	二氧化硫去除率	+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
	PM2.5	-
居民生活水平	人均 GDP	+
	人均教育支出（元/人）	+
	人均医院床位数（张/万人）	+

3.3.2 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测度

在对现有文献进行综合梳理后，我们发现常见的赋权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主观赋权法，这种方法虽然操作简单，但评估结果往往受到较强的主观性影响，因此在实际应用中的参考意义有限。第二种是客观赋权法，它通过公式计算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干扰，使结果更为客观和准确。其中，熵值法、BP 神经网络算法等是常用的客观赋权方法。

为了更全面、客观地反映评价指标的实际情况，本文参考了徐亚平等（2023）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并选取了陕西省 10 个市在 2011 年至 2021 年间的数据库。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Wind 资讯数据库等渠道。部分数据还经过了原始数据的

计算和整理。在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时，本文选择了熵值法。熵值法是一种基于信息论的客观赋权方法，用于综合评价和决策分析中，通过计算每个指标的信息熵，来衡量指标的离散程度。信息熵越小，表示该指标的数据变异程度大，提供的信息量多，相应的权重应更大。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无量纲化处理

通过标准化处理，消除各指标不同量纲的问题：

$$Y_{ij} =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 0.0001, X_{ij} \text{ 为正向指标} \quad (3.1)$$

$$Y_{ij} = \frac{\max(X_{ij}) - X_{ij}}{\max(X_{ij}) - \min(X_{ij})} + 0.0001, X_{ij} \text{ 为正向指标} \quad (3.2)$$

其中， i 代表城市， j 代表测度指标， $\min(X_{ij})$ 代表指标最小值， $\max(X_{ij})$ 代表指标最大值， X_{ij} 表示原始指标数据， Y_{ij} 表示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

(2) 计算 Y_{ij} 的比重 P_{ij}

$$P_{ij} = \frac{Y_{ij}}{\sum_{i=1}^n Y_{ij}} \quad (3.3)$$

(3)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_j

$$e_j = \ln \frac{1}{n} \sum_{i=1}^n P_{ij} \ln(P_{ij}) \quad (3.4)$$

(4)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λ_j

$$\lambda_j = 1 - e_j \quad (3.5)$$

(5) 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 ω_j

$$\omega_j = \frac{\lambda_j}{\sum_{j=1}^m \lambda_j} \quad (3.6)$$

(6) 计算第 i 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QUA_i = \sum_{j=1}^n \omega_j * Y_{ij} \quad (3.7)$$

3.4 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分析

3.4.1 陕西总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图 3.6 展示了 2011 年至 2021 年间，陕西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总体得分均值，呈现出一种稳步上升的趋势。同样，图 3.7 也描绘了陕西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进步态势，两者均稳健攀升。在这一时期，陕西省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通过增强对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与提升。此外，陕西省还在这段时间内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在交通、能源、信息等关键领域的战略性投资，显著改善了区域的交通运输效率和市场网络连通性。这些努力不仅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支撑，也为陕西省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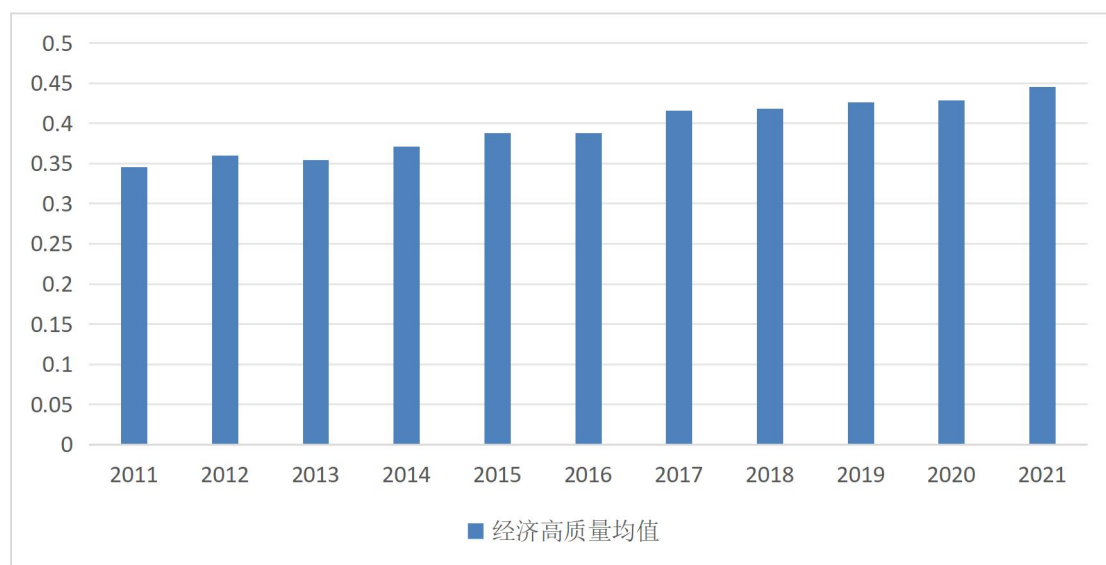


图 3.6 陕西 2011-2021 经济高质量发展得分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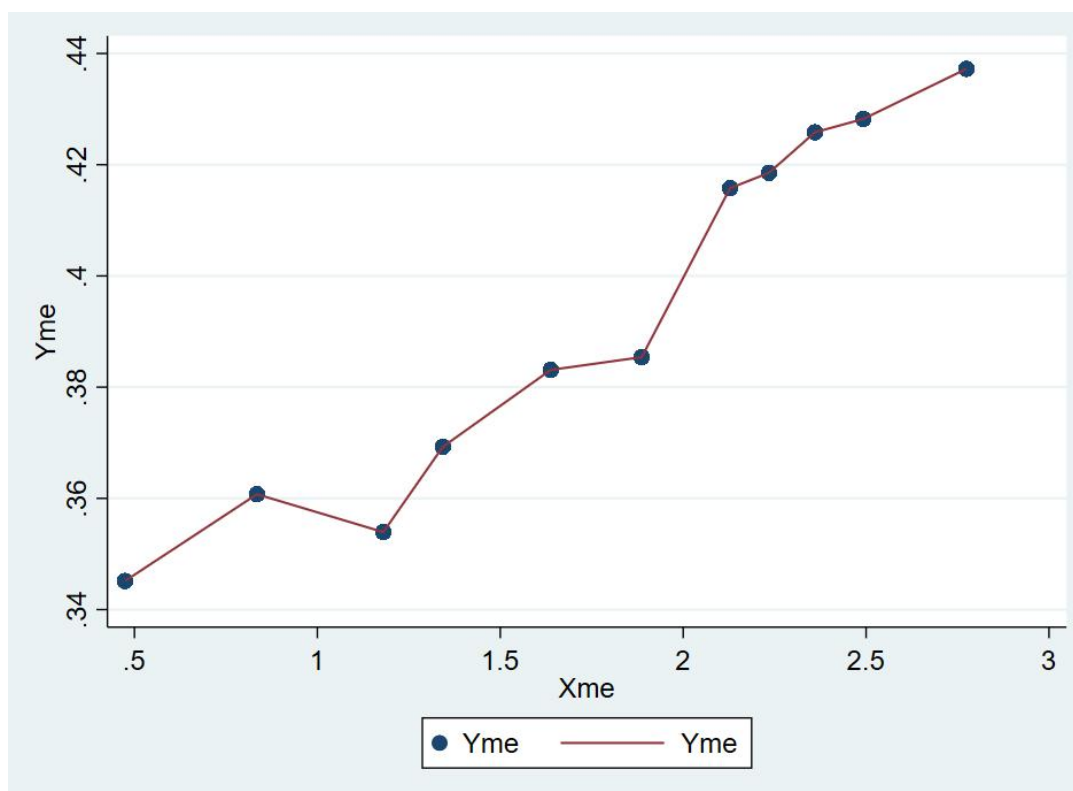


图 3.7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趋势

3.4.2 陕西十个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测算结果

表 3.4 反映了 2011—2021 年陕西省十个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指数情况，可以看出，首先，从整体趋势来看，尽管在某些年份存在波动，但大多数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过去十年中，陕西省及各市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 2017 年至 2021 年间，多数市的增长速度加快，显示出省内各市经济发展积极响应“十三五规划”政策，努力在提升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向国家战略目标靠拢。

其次，从具体城市来看，西安市作为陕西省的省会城市，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但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安康市则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其综合指数从 2011 年的 0.353 增长到 2021 年的 0.476，增幅显著。宝鸡市和汉中市也表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宝鸡市在近几年中的增长势头强劲。然而，也需要注意到不同城市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和不平衡性。一些城市如商洛市和铜川市在某些年份的综合指数较高，但在其他年份则相对较低，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而渭南市和咸阳市则在整个考察期间内综合指数变化相对较小。

表 3.4 陕西各市 2011—2021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年份	安康	宝鸡	汉中	商洛	铜川	渭南	西安	咸阳	延安	榆林
2011	0.353	0.336	0.343	0.365	0.342	0.348	0.330	0.349	0.335	0.351
2012	0.384	0.367	0.371	0.355	0.358	0.373	0.330	0.366	0.374	0.323
2013	0.360	0.346	0.365	0.336	0.347	0.367	0.332	0.340	0.377	0.371
2014	0.365	0.357	0.378	0.387	0.382	0.377	0.374	0.394	0.346	0.350
2015	0.399	0.362	0.407	0.385	0.413	0.361	0.371	0.402	0.400	0.379
2016	0.378	0.424	0.365	0.376	0.386	0.409	0.365	0.401	0.396	0.375
2017	0.408	0.392	0.442	0.429	0.415	0.391	0.386	0.436	0.438	0.421
2018	0.384	0.418	0.397	0.454	0.387	0.455	0.436	0.390	0.449	0.415
2019	0.394	0.451	0.430	0.444	0.396	0.409	0.402	0.461	0.455	0.416
2020	0.405	0.470	0.417	0.419	0.411	0.425	0.465	0.416	0.406	0.448
2021	0.476	0.433	0.486	0.438	0.433	0.433	0.446	0.425	0.437	0.44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作者总结计算

从区域发展来看，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区，作为省会和区域经济中心，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开放度。关中地区聚集了大量的高等教育机构、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资源丰富，科技创新能力强，这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政策优势明显，吸引了大量的内外资企业和人才，推动了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因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上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陕南地区（安康、商洛、汉中），以农业为主，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较好。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陕南地区通过发展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和新能源等产业，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然而，由于地处山区，交通相对不便，科教资源相对集中度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速度。陕北地区（延安、榆林），资源型经济特征明显，特别是能源资源丰富。这一地区在过去依靠资源优势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型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陕北地区正努力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科技创新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措施，实现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变。尽管如此，相比关中地区，陕北地区在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影响了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提升。

4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我国 2011—2021 年陕西省十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地级市统计年鉴，获取有效样本数量为 110 个，本文所有数据的整理、计算与回归过程中所使用的软件为 Stata17.0。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 的缩尾处理。

4.2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模（4.1）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模型（4.2）—（4.3）检验创新投入、网络发展的中介效应。其中， i 表示每一个省份， t 表示每一年，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合集， $Year$ 为年份固定效应， u 为个体固定效应， ε 为残差。

$$QUA_{i,t} = a_0 + a_1 DIG_{i,t} + a_2 Controls_{i,t} + \sum Year + u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1)$$

$$PAT_{i,t} / INT_{i,t} = b_0 + b_1 DIG_{i,t} + b_2 Controls_{i,t} + \sum Year + u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2)$$

$$QUA_{i,t} = c_0 + c_1 DIG_{i,t} + c_2 Controls_{i,t} + c_3 PAT_{i,t} / INT_{i,t} + \sum Year + u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3)$$

被解释变量为经济高质量，设定了由产业结构、包容性 TFP、技术创新、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 5 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多维度评价体系，对陕西各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算。

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采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衡量（梁雨凡等，2024；陈楚文等，2024）。中介变量包括创新（陈佳等，2024；李元霞等，2024）与互联网发展两个指标。此外，本文还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财政支出、贸易进出口、外商投资、户籍人口等控制变量。详细的变量定义见表 4.1。

表 4.1 变量说明

类型	符号	说明
被解释变量	QUA	经济高质量，熵值法构造，见文中
解释变量	DIG	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100
中介变量	PAT	专利申请数，取自然对数
	INT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取自然对数
	LGDP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CONS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取自然对数
	FIN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TRA	(货物进口额+货物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
	IND	外商投资企业数，百个
	PEO	户籍人口，百万人

4.3 描述性统计

表 4.2 给出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 QUA 的最小值为 0.330，最大值为 0.476，说明陕西省各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整体波动幅度不大；解释变量 DIG 均值为 1.759，表明陕西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中介变量，创新 PAT 的均值为 2.109，互联网发展 INT 的最小值为 11.002，最大值为 20.282。对于控制变量，LGDP 经过了自然对数化处理，最终相差不大。财政支持 FIN 均值为 0.223。IND 最小值为 0.010，最大值为 0.990。综上所述，本文所选取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中介变量与控制变量均分布在合理区间。

将陕西省划分为陕南、陕北与关中三个地区，其中，陕南包括汉中、安康、商洛；陕北包括榆林、延安；关中包括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表 4.3 给出了三个地区的对比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经济高质量 QUA 在陕南地区为 0.397，陕北地区均值为 0.396，关中地区 QUA 为 0.390。对于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 DIG 在陕北地区为 1.730，陕南地区为 1.665，关中地区为 2.230。

表 4.2 描述性统计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QUA	110	0.393	0.038	0.330	0.476
DIG	110	1.759	0.714	0.360	2.924
PAT	110	2.109	3.533	0.000	11.304
INT	110	13.753	1.820	11.002	20.282
LGDP	110	16.470	0.842	14.821	18.423
CONS	110	15.198	0.997	13.186	17.725
FIN	110	0.223	0.070	0.131	0.390
TRA	110	0.019	0.070	0.000	0.396
IND	110	0.153	0.266	0.010	0.990
PEO	110	3.947	2.084	0.785	9.870

表 4.3 描述性统计-地区差异对比

	陕南 N=33	陕北 N=22	关中 N=55
QUA	0.397	0.396	0.390
DIG	1.665	1.730	1.826
PAT	1.965	2.023	2.230
INT	13.408	14.102	13.819
LGDP	15.939	16.874	16.627
CONS	14.705	14.992	15.577
FIN	0.284	0.203	0.195
TRA	0.005	0.002	0.034
IND	0.028	0.034	0.275
PEO	3.127	3.076	4.787

4.4 相关性分析

表 4.4 列出了这个模型中主要系数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解释变量 DIG 与被解释变量 QUA 的相关系数值为 0.784，在 1%水平显著；中介变量 PAT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QUA 的相关系数值为 0.430，INT 与 QUA 的相关系数值为 0.555，在 1%水平显著。从表 4.4 中可以看出，从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来看，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都比较小，不太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因此，理论上可以放入同一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表 4.4 相关性分析

	QUA	DIG	PAT	INT	LGDP	CONS	FIN	TRA	IND	PEO
QUA	1									
DIG	0.784***	1								
PAT	0.430***	0.425***	1							
INT	0.555***	0.651***	-0.0150	1						
LGDP	0.230**	0.404***	0.215**	0.485***	1					
CONS	0.277***	0.519***	0.268***	0.492***	0.898***	1				
FIN	0.113	0.00700	-0.00300	-0.151	-0.777***	-0.638***	1			
TRA	0.307***	0.374***	0.210**	0.311***	0.441***	0.509***	-0.228**	1		
IND	-0.0400	0.193**	0.0710	0.327***	0.672***	0.800***	-0.500***	0.568***	1	
PEO	0.0160	0.162*	0.115	0.320***	0.817***	0.863***	-0.645***	0.525***	0.851***	1

(***、**、*分别表示 1%、5%、10%水平上显著，下同)

4.5 实证结果分析

4.5.1 回归结果

表 4.5 给出了基本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中，DIG 与 QUA 在未考虑控制变量时一元回归系数值为 0.044，在 1%水平显著。第（2）—（7）列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全变量回归下，DIG 系数值为 0.039，在 1%水平显著。以上结果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和应用极大地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将金融服务延伸到陕西省的偏远地区，使更多人享受到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这种覆盖面的扩大，有助于缓解金融排斥现象，促进金融资源的均衡分配，从而推动陕西省经济的全面发展。

其次，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便捷性。通过在线平台、手机 APP 等渠道，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金融交易，无须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种高效的金融服务模式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还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使得更多人能够负担得起金融服务，进一步促进了金融服务的普及。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精准对接陕西省的经济发展需求。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深入了解陕西省的产业特点、企业需求以及个人消费者的偏好，从而提供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种精准对接有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推动陕西省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最后，数字普惠金融还有助于提升陕西省的金融创新能力。通过引入新的技术手段和业务模式，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传统金融机构的创新转型，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这种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陕西省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金融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表 4.5 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QUA	QUA	QUA	QUA	QUA	QUA	QUA
DIG	0.044*** (19.775)	0.039*** (5.961)	0.040*** (5.903)	0.039*** (3.339)	0.040*** (3.977)	0.040*** (3.934)	0.039*** (3.460)
LGDP		0.015 (0.612)	0.015 (0.617)	0.017 (0.460)	-0.001 (-0.033)	-0.005 (-0.175)	-0.003 (-0.096)
CONS			-0.001 (-0.265)	-0.002 (-0.335)	0.002 (0.455)	0.004 (0.725)	0.004 (0.744)
FIN				0.013 (0.119)	-0.012 (-0.119)	-0.010 (-0.104)	-0.009 (-0.084)
TRA					0.102*** (6.332)	0.089*** (5.414)	0.108*** (4.986)
IND						0.183 (1.718)	0.195* (1.893)
PEO							-0.005 (-0.985)
_cons	0.316*** (80.653)	0.082 (0.212)	0.099 (0.256)	0.070 (0.120)	0.303 (0.620)	0.325 (0.645)	0.304 (0.579)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R-squared	0.683	0.685	0.685	0.685	0.706	0.714	0.714

(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拓宽金融服务覆盖范围、提高服务效率和便捷性、精准对接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提升金融创新能力等多个方面，显著提高了陕西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数字普惠金融在陕西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4.5.2 拓展性检验

将数字普惠金融细分为覆盖广度、发展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对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 QUA 进行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4.6 中。

第(1)列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COV 对 QUA 的回归系数值为 0.029,在 10%水平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显著提高了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提升有助于促进产业创新和升级。通过为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不仅提高了陕西省的产业结构水平,还增强了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提升还增强了陕西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韧性。在面对经济波动和风险挑战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更加及时、有效的金融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种稳定性和韧性的提升有助于增强陕西省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第(2)列中,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 DEP 对 QUA 的回归系数值为 0.035,在 1%水平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显著提高了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深度的增加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在覆盖广度上有所扩展,而且在服务质量和深度上也有了显著提升。这使得金融服务能够更加精准地满足陕西省不同领域、不同企业的需求,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通过提供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支持陕西省的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增长。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的提升还有助于推动金融创新和金融生态系统的完善。通过引入新的技术和业务模式,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激发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够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推动金融生态系统的完善和优化,为陕西省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金融支撑。

第(3)列中,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GIT 对 QUA 的回归系数值为 0.018,在 5%水平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显著提高了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数字化通过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便捷性,显著推动了陕西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金融机构可以迅速、准确地处理和分析金融信息,从而更加精准地满足企业和个人的金融需求。这不仅缩短了金融交易的时间,降低了交易成本,还提升了用户体验,为陕西省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进一步地,金融数字化促进了陕西省金融服务的普及和优化。传统的金融服务往往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而金融数字化则打破了这些限制,使得金融服务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地区,惠及更多的群体。同时,金融数字化还推动了金融服务的创新,如智能投顾、数字货币等新兴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为陕西省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表 4.6 拓展性检验：基于数字普惠子指标

	(1) QUA 覆盖广度	(2) QUA 发展深度	(3) QUA 数字化程度
COV	0.029* (1.873)		
DEP		0.035*** (4.993)	
GIT			0.018** (3.130)
LGDP	0.017 (0.432)	0.003 (0.124)	0.033 (1.180)
CONS	0.009 (0.930)	0.006 (0.853)	0.011 (1.078)
FIN	0.087 (0.710)	-0.013 (-0.169)	0.076 (0.819)
TRA	0.097** (2.733)	0.129*** (4.909)	0.160*** (3.310)
IND	0.144 (1.202)	0.265** (2.914)	0.276** (2.571)
PEO	-0.001 (-0.139)	-0.013** (-2.902)	-0.020* (-2.217)
_cons	-0.117 (-0.186)	0.208 (0.519)	-0.340 (-0.854)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110	110	110
R-squared	0.699	0.722	0.700

4.5.3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增强基本结论的稳健性，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在本节中，将“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对样本数据重新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4.7 中。可知，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无论一元回归还是多元回归，核心解释变量 DIG 系数值均显著为正，在 1%水平显著，与基本回归一致，进一步说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表 4.7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UPG	UPG	UPG	UPG	UPG	UPG	UPG
DIG	0.218*** (9.225)	0.444*** (8.882)	0.469*** (7.173)	0.248*** (3.575)	0.259*** (4.019)	0.257*** (4.134)	0.252*** (3.867)
LGDP		-0.689*** (-4.992)	-0.683*** (-4.917)	-0.069 (-0.421)	-0.234 (-1.490)	-0.277* (-1.823)	-0.268* (-1.712)
CONS			-0.052 (-0.605)	-0.125 (-1.645)	-0.088 (-1.237)	-0.073 (-1.057)	-0.072 (-1.044)
FIN				4.346*** (5.584)	4.111*** (5.685)	4.131*** (5.923)	4.138*** (5.899)
TRA					0.953*** (4.111)	0.825*** (3.617)	0.898** (2.462)
IND						1.785*** (2.858)	1.832*** (2.805)
PEO							-0.020 (-0.259)
_cons	0.388*** (8.687)	11.336*** (5.169)	11.980*** (4.902)	2.407 (0.879)	4.567* (1.764)	4.779* (1.913)	4.701* (1.859)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R-squared	0.462	0.571	0.573	0.678	0.726	0.748	0.748

(2) 剔除疫情因素

2019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对我国经济造成了较大影响。疫情期间，由于防控措施导致部分行业停工停产，旅游、餐饮等服务业受到较大影响，陕西省部分地区的经济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为了避免疫情因素影响剔除2020年及其以后期间样本，对剩余数据重新回归，结果报告在表4.8中。可知，在改变研究期间后，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无论一元回归还是多元回归，核心解释变量DIG系数值均显著为正，在1%水平显著，与基本回归一致，进一步说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数字化程度提升可以加快金融服务的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普惠性。这有助于推动陕西省各行业的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

表 4.8 稳健性检验：剔除疫情期间（2020—2021 年）

	(1)	(2)	(3)	(4)	(5)	(6)	(7)
	QUA	QUA	QUA	QUA	QUA	QUA	QUA
DIG	0.044*** (12.477)	0.047*** (6.361)	0.050*** (6.466)	0.044*** (5.565)	0.044*** (5.979)	0.048*** (5.326)	0.050*** (5.053)
LGDP		-0.012 (-0.504)	-0.012 (-0.497)	0.004 (0.166)	-0.005 (-0.220)	-0.012 (-0.424)	-0.012 (-0.396)
CONS			-0.004 (-1.178)	-0.006 (-1.580)	-0.004 (-0.924)	-0.006 (-1.413)	-0.007 (-1.659)
FIN				0.115 (1.324)	0.103 (1.132)	0.080 (0.874)	0.047 (0.548)
TRA					0.087*** (4.106)	0.088*** (4.138)	0.193** (2.392)
IND						0.154* (1.840)	0.296** (2.345)
PEO							-0.027 (-1.522)
_cons	0.316*** (57.827)	0.503 (1.351)	0.559 (1.465)	0.313 (0.742)	0.445 (1.124)	0.543 (1.240)	0.660 (1.424)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90	90	90	90	90	90	90
R-squared	0.676	0.677	0.678	0.680	0.695	0.700	0.712

(3) 考虑滞后效应

上文已经基本证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仅仅检验解释变量对于本期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节中，为了避免自变量与因变量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将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对被解释变量重新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4.9 中。可知，解释变量 DIG 对于未来一期被解释变量 QUA 的回归系数值均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基本结论，也说明本文不太可能存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表 4.9 稳健性检验：考虑滞后效应

	(1)	(2)	(3)	(4)	(5)	(6)	(7)
	QUA _{t+1}	QUA _{t+1}	QUA _{t+1}	QUA _{t+1}	QUA _{t+1}	QUA _{t+1}	QUA _{t+1}
DIG	0.044*** (14.853)	0.041*** (6.243)	0.049*** (6.533)	0.052*** (4.826)	0.052*** (4.725)	0.053*** (4.314)	0.054*** (5.060)
LGDP		0.008 (0.310)	0.009 (0.384)	0.001 (0.049)	-0.005 (-0.257)	-0.005 (-0.285)	-0.009 (-0.639)
CONS			-0.015* (-1.908)	-0.014* (-1.852)	-0.013 (-1.623)	-0.013 (-1.624)	-0.013 (-1.659)
FIN				-0.060	-0.062	-0.065	-0.027

续表 4.9 稳健性检验：考虑滞后效应

	(1)	(2)	(3)	(4)	(5)	(6)	(7)
	QUA _{t+1}	QUA _{t+1}	QUA _{t+1}	QUA _{t+1}	QUA _{t+1}	QUA _{t+1}	QUA _{t+1}
				(-0.341)	(-0.355)	(-0.361)	(-0.148)
TRA					0.044*	0.044*	-0.061**
					(2.153)	(1.909)	(-2.332)
IND						0.011	-0.093
						(0.086)	(-0.553)
PEO							0.028***
							(3.602)
_cons	0.325***	0.202	0.387	0.524	0.597	0.606	0.561*
	(66.845)	(0.503)	(1.012)	(1.482)	(1.787)	(1.712)	(1.960)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R-squared	0.640	0.640	0.645	0.646	0.650	0.650	0.663

(4) PSM 倾向得分匹配

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被解释变量受到的影响因素众多，不仅涵盖了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方面，还广泛涉及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多种要素。鉴于这种复杂性，本研究在开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因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为了更为严谨地探究各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本文特别采用了倾向值匹配得分法（PSM）进行深入的检验和分析。采用 1:3 近邻匹配，匹配效果图 4.1 与表 4.10，可知匹配效果良好。将匹配后样本重新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4.11 中。无论一元回归还是多元回归，核心解释变量 DIG 系数值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不太存在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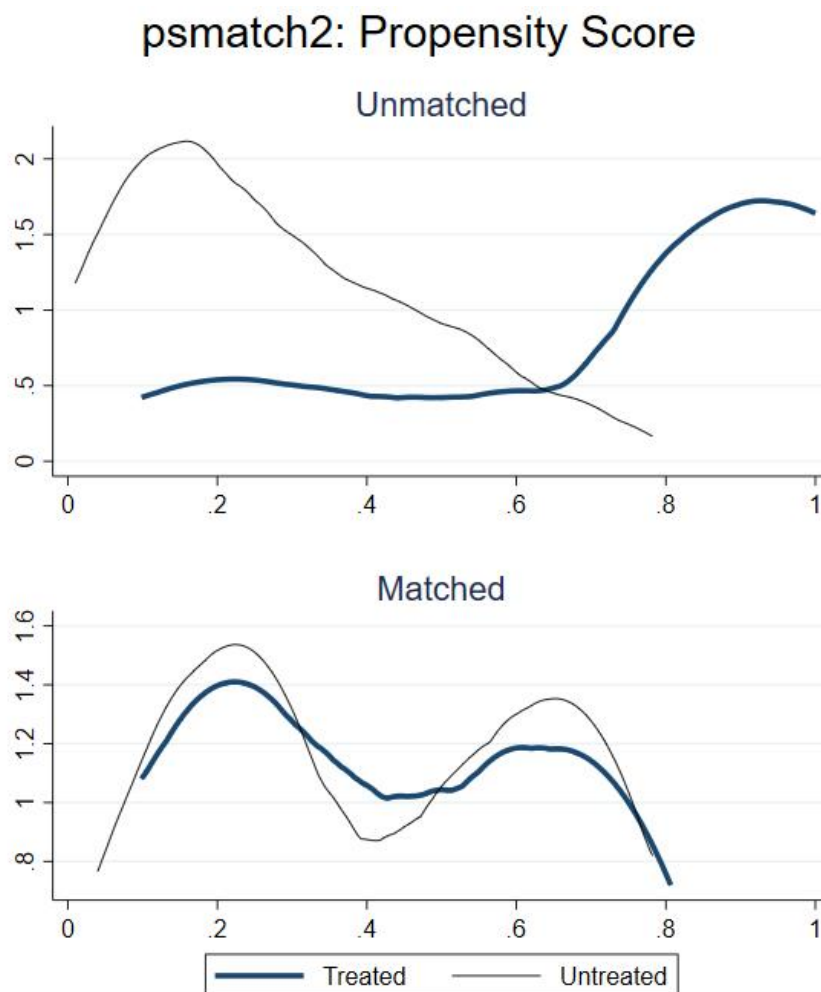


图 4.1 PSM 密度图

表 4.10 平衡性检验

	Matched	MEAN		%bias	%Reduce		p>t	V(C)
		Treated	Control		bias	t		
LGDP	U	16.865	16.075	105.900		5.550	0.000	2.00*
	M	16.372	16.181	25.700	75.700	0.750	0.455	1.580
CONS	U	15.661	14.735	104.500		5.480	0.000	2.34*
	M	14.810	14.864	-6.100	94.100	-0.270	0.787	0.670
FIN	U	0.182	0.264	-145.700		-7.640	0.000	1.640
	M	0.234	0.243	-15.700	89.200	-0.490	0.626	2.65*
TRA	U	0.034	0.005	42.400		2.220	0.028	151.31*
	M	0.004	0.005	-1.300	96.800	-0.410	0.685	0.860
IND	U	0.262	0.044	89.600		4.700	0.000	92.98*
	M	0.037	0.050	-5.300	94.100	-1.530	0.135	0.30*
PEO	U	4.688	3.206	75.800		3.970	0.000	2.82*
	M	2.936	3.088	-7.800	89.700	-0.350	0.728	0.660

表 4.11 内生性检验：PSM 倾向得分匹配

	(1)	(2)	(3)	(4)	(5)	(6)	(7)
	QUA	QUA	QUA	QUA	QUA	QUA	QUA
DIG	0.045*** (21.816)	0.046*** (6.372)	0.047*** (5.475)	0.053*** (4.624)	0.045** (3.269)	0.045** (2.562)	0.045** (2.498)
LGDP		-0.002 (-0.081)	-0.001 (-0.061)	-0.030 (-0.694)	-0.040 (-0.839)	-0.040 (-0.744)	-0.041 (-0.775)
CONS			-0.002 (-0.219)	0.009 (0.658)	0.023 (0.978)	0.023 (1.010)	0.025 (1.106)
FIN				-0.178 (-1.197)	-0.237 (-1.318)	-0.239 (-1.063)	-0.236 (-1.057)
TRA					0.632 (1.205)	0.642 (0.922)	0.763 (1.307)
IND						-0.010 (-0.026)	-0.010 (-0.028)
PEO							0.042 (1.140)
_cons	0.315*** (87.476)	0.343 (1.018)	0.369 (1.024)	0.694 (1.225)	0.668 (1.109)	0.675 (0.907)	0.546 (0.698)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68	68	68	68	68	68	68
R-squared	0.719	0.719	0.719	0.726	0.733	0.733	0.736

4.5.4 异质性检验

本节中，基于经济发展、财政支持与地区分布异质性，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对于经济发展异质性，计算 LGDP 中位数，大于等于中位数为经济发展较快、否则为经济发展较慢。对于财政支出计算方法一致。

表 4.12 的第 (1) — (2) 列中，对于经济发展较快地区，DIG 系数值为-0.012，并不显著；对于经济发展较慢地区，DIG 系数值为 0.051，在 10%水平显著。以上结果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在经济发展较慢地区更加显著。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往往面临着金融服务覆盖不全、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导致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通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地域限制，使得金融服务能够更加便捷、高效地覆盖到这些地区。这不仅能够为当地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加广泛、深入的金融服务，还能够促进金融资源的均衡分配，为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注入新的活力。其次，数字普

惠金融的普惠性特点使得其能够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较慢地区的需求。这些地区往往存在着小微企业众多、金融服务需求多样化等特点。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些需求，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例如，通过为小微企业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这些企业解决资金问题，促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的繁荣。

第(3)－(4)列中，对于财政支出较高地区，DIG系数值为0.043，在5%水平显著；对于财政支出较低地区，DIG系数值为0.024，并不显著。以上结果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在财政支出较高地区更加显著。在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政府对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投入往往更大，这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资金支持。这些地区可能更容易吸引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入驻，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和应用，进而形成金融和产业的良性互动。其次，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通常具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这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和推广提供了有力保障。良好的交通、通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以及高效的政府服务和监管体系，有助于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营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此外，在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企业和个人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可能更加旺盛和多样化。这些地区可能拥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他们对于融资、支付、保险等金融服务的需求更加迫切。数字普惠金融的灵活性和创新性，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些多样化的需求，推动当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表 4.12 异质性检验

	经济发展差异		财政支持差异	
	(1) QUA 较快	(2) QUA 较慢	(3) QUA 较高	(4) QUA 较低
DIG	-0.012 (-0.500)	0.051* (2.316)	0.043** (3.020)	0.024 (0.894)
LGDP	0.092 (1.656)	-0.047 (-0.888)	-0.055 (-1.252)	0.061 (0.868)
CONS	0.041* (2.098)	0.008 (1.130)	0.025* (2.309)	-0.009 (-1.590)
FIN	0.671 (1.480)	-0.227 (-1.411)	-0.237 (-1.558)	0.419 (0.712)
TRA	0.099*** (7.258)	0.985 (1.609)	1.378* (2.133)	0.094*** (8.987)

续表 4.12 异质性检验

	经济发展差异		财政支持差异	
	(1)	(2)	(3)	(4)
	QUA	QUA	QUA	QUA
	较快	较慢	较高	较低
IND	0.224 (1.482)	-0.075 (-0.190)	-0.248 (-0.591)	0.277* (2.226)
PEO	-0.011** (-2.710)	0.033 (0.296)	0.049 (0.868)	-0.010* (-2.364)
_cons	-1.927 (-2.000)	0.910 (0.912)	0.771 (1.249)	-0.645 (-0.555)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55	55	55	55
R-squared	0.742	0.701	0.710	0.715

表 4.13 汇报了基于地区分布异质性下的对比回归结果。对于陕南地区，DIG 系数值为 0.106，在 5%水平显著；对于关中与陕北地区，DIG 系数值并不显著。以上结果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相比陕北与关中地区，该正面效应在陕南地区更显著。

第一，陕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原因，传统金融服务覆盖相对不足，金融资源分配不够均衡。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通过其普惠性和便捷性，能够迅速填补这一空白，为陕南地区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加广泛、深入的金融服务。这有助于打破地域限制，促进金融资源的均衡分配，从而推动陕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二，陕南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色，但受限于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一定制约。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结合陕南地区的实际情况，提供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例如，通过提供供应链金融、农业保险等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陕南地区的农业和旅游业实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陕南地区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应用方面有着较为坚实的基础。这为数字普惠金融在当地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更好地分析陕南地区的市场需求和风险状况，为当地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

第四，陕南地区政府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加强监管和引导，政府为数字普惠金融在当地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

市场氛围。这有助于激发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陕南地区的深入发展。

表 4.13 异质性检验：基于地区分布异质性

	(1)	(2)	(3)
	QUA	QUA	QUA
	陕南	关中	陕北
DIG	0.106** (2.751)	0.004 (0.160)	-0.007 (-0.122)
LGDP	-0.255** (-2.605)	0.099 (1.351)	-0.052 (-0.553)
CONS	0.087* (1.771)	-0.002 (-0.106)	0.145 (1.403)
FIN	-0.438** (-2.296)	0.304 (1.307)	-0.506 (-0.767)
TRA	1.456* (1.803)	0.134* (1.850)	1.067 (0.331)
IND	-0.428 (-1.011)	0.196 (1.428)	-0.817 (-0.945)
PEO	0.024 (0.086)	-0.020 (-1.160)	0.337 (1.419)
_cons	3.052* (1.925)	-1.258 (-1.106)	-1.803 (-0.990)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33	55	22
R-squared	0.783	0.721	0.836

4.5.5 影响机理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推动创新投入、网络发展，进而促进陕西整体高质量发展。表 4.14 给出了影响机理检验结果。其中，第（1）—（2）列中，DIG 对于 PAT 系数值为 3.228，PAT 对于 QUA 系数值为 0.002，在 1%水平显著。以上结果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推动创新投入进而促进陕西整体高质量发展。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陕西省的金融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金融资源得以更加高效地配置到创新领域。这为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推动了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促进了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为创新活动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激发了创新的潜力和活力。

第(3)－(4)列中, DIG对于INT系数值为1.558, INT对于QUA系数值为0.003,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说明,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推动网络发展, 进而促进陕西整体高质量发展。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 数字普惠金融得以更加精准、高效地服务于广大用户。网络的发展不仅为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技术支撑, 还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使得更多人能够享受到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网络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通过网络平台, 金融机构能够更快速地获取用户信息, 分析用户需求, 从而推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 网络平台还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与用户直接互动的渠道, 便于收集用户反馈, 优化服务流程, 提升用户体验。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陕西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开始利用网络平台开展金融服务, 推动了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网络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作用, 使得陕西省在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率的同时, 也有效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这不仅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便捷性, 还促进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为陕西省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表 4.14 影响机理检验

	创新效应		网络发展	
	(1) PAT	(2) QUA	(3) INT	(4) QUA
DIG	3.228** (2.073)	0.040*** (3.600)	1.558** (2.490)	0.035*** (5.148)
PAT		0.002*** (3.232)		
INT				0.003** (1.998)
LGDP	-1.374 (-1.504)	-0.018 (-0.678)	0.604 (0.401)	0.002 (0.230)
CONS	-0.058 (-0.174)	0.001 (0.108)	-0.723 (-1.086)	-0.000 (-0.008)
FIN	-12.406*** (-2.996)	-0.065 (-0.545)	-0.748 (-0.111)	0.049 (0.824)
TRA	-2.529 (-1.225)	0.123** (1.988)	1.309 (0.373)	0.098** (2.411)
IND	-15.297*** (-3.593)	0.416*** (3.212)	35.332*** (5.631)	-0.064*** (-3.606)
PEO	1.577*** (3.513)	-0.014 (-1.086)	-1.351* (-1.834)	0.003 (1.018)

续表 4.14 影响机理检验

	创新效应		网络发展	
	(1) PAT	(2) QUA	(3) INT	(4) QUA
_cons	20.113 (1.337)	0.604 (1.384)	12.136 (0.500)	0.242* (1.692)
地级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110	110	110	110
R-squared	0.981	0.744	0.586	0.698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分析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理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把 2011—2021 年陕西省十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以及三个主要维度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紧接着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疫情期间(2020—2021 年)数据、考虑滞后效应、PSM 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然后通过对比分析不同经济发展、财政支持和地区分布背景下的样本数据,进行异质性检验;最后,引入中介变量创新投入和网络发展两个维度进行再次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结合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回归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因此,应进一步加大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推动其深入发展,为陕西省乃至全国的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在经济发展较慢地区更加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弥补了经济发展较慢地区的金融服务空白与资源分配不均,为其注入新活力。其普惠性特点能精准对接小微企业的多样化金融需求,通过提供便捷、低成本的个性化服务,助力企业成长,进而推动当地经济繁荣。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在财政支出较高地区更加显著。在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政府的经济与产业升级投入为数字普惠金融营造了优越的政策与资金环境,吸引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的集聚,推动其创新应用,并与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服务质效。同时,旺盛且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进一步凸显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对当地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第四,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上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相比陕北与关中地区,该正面效应在陕南地区更显著。在陕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填补了传统金融服务覆盖不足,促进了金融资源的均衡分配,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结合陕南地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定制化

的服务，支持了特色产业的升级发展。在数字技术和政府支持的共同推动下，数字普惠金融在陕南地区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发展潜力。

第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推动创新投入、网络发展，进而促进陕西高质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陕西省的深入发展显著优化了金融环境，高效配置了金融资源至创新领域，为企事业创新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激发了创新潜力。同时，数字技术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拓宽了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了服务效率和用户体验，推动了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为陕西省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5.2 对策建议

目前，陕西省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上遇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问题，这在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过程中还未能展现出有效的协同效应。因此，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陕西省经济高效增长方面的多个潜在贡献点，考虑到地区的具体条件，陕西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以及民众需要共同作用，以期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力量加速陕西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5.2.1 优化顶层设计，增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性

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知识，让人民群众获知相关知识是经济得以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政策能顺利推进的关键一步。

(1) 健全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法律法规。

为了确保能够享受普惠金融服务的企业遵守适当的运营标准，并保障金融服务的长期可持续性，需要明确设定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的责任和范围，对金融机构在用户数据的采集、保存、处理及使用方面进行规范管理。同时，加强管理层的领导力。利用全省数字经济的发展协调机制，成立陕西省数字经济发展顾问委员会，以优化数字经济的推进流程。清晰定义任务目录，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工作记录，确立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协作模式和闭环的管理机制，共同推动工作进程。

(2) 强化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致力于加速 5G 网络的扩展，目标是超过 11 万个 5G 基地的建立，初步建成覆盖全省的 5G 网络，实现热点区域多网络共存和偏远地区网络支撑的布局；推动极低延迟网络的快速发展，目标是打造 10 个千兆级城市，确保乡镇及以上地区以及关键行政村落

实双千兆网络全覆盖；整合算力基础架构，积极努力使陕西成为国家东数西算项目的关键节点之一，促进算法与网络的融合发展，完全融入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网络；推进国家工业互联网陕西区域中心以及行业中心的建设，发展先进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应用，目标是建立3个省级行业推进中心和6个行业级标识解析节点；改善智能充电基础设施，加强电动车充换电网络建设，实现城市区域2公里充电服务网，乡镇及以上区域和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确保新建住宅区车位配备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空间，推广陕西智能车联网平台，实现充电桩全接入；强化数字化融合基础设施的发展，提升公路、大桥、隧道及陡峭边坡的智能监控、预警、巡检和数字化管理能力，加快建设全省水资源监控的大型平台。

（3）大力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知识。

政府及金融监督部门应为不同年龄和教育背景的人群设计专门的知识传播方案，通过互联网、社交网络、电视等多样化的传媒手段来推广普惠金融知识，同时推动优秀的数字普惠金融实践案例的分享，通过示例教育的方式向大众普及相关知识和经验。设立评价机制，定期审查推广活动的成效，并根据反馈优化策略，形成正反馈循环。鼓励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通过设立特别职位来吸引所需的高级人才，并在职称评审、孩子入学、购房和医疗等方面提供相应的支持措施。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开展数字经济等相关学科教育，优先扶持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博士和硕士项目申请。鼓励企业与高等学院、科研机构共同创建联合实验室和实训基地，专注于培养高级研究和高技能专才。

5.2.2 强化技术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纵深发展

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推动数字产业的创新发展。通过改善旧产业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引入新技术，探索新模式，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效率以及服务范围，深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1）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

强化能源和化工行业的数字示范应用，促进行业领军企业加深数字化改造示范，在生产各个环节推行数字技术，培养2至3个国内领先的转型支持机构；加速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革和提升，执行设备升级换代、生产线更新及自动化改造，推进产业链数字化整合项目，鼓励主导企业建设数字化合作与共享平台，打破关键环节障碍，引导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立数字化改造服务平台，发展针对产业链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提供多元化服务，提高园区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推动智能物流的发

展，支持物流巨头实施无人仓库、自动驾驶车辆等大规模应用，激励传统物流企业进行数字升级。

（2）推进数字产业化创新发展

首先，应加强集成电路产业的集群发展，利用西安在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及科教资源方面的优势，推进关键项目的建设，并促进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其次，建议加速智能终端产业集群的成长，以行业领先企业为中心，深化智能终端产业链的发展。此外，推荐发展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产业集群，并筹建西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以加快信息服务业向云平台模式的转型。同时，建议培养光子产业集群，完善光子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的功能，支持光子产业的创新中心和联合体发展，旨在构建国家级光子领域创新平台。

5.2.3 制定差别化战略，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

鉴于陕西省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导致了金融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也各不相同。采取一刀切的数字普惠金融策略可能会妨碍整个地区的进步。因此，有必要根据每个地区的具体发展状况定制化发展策略，并在金融服务方式上不断进行创新。

（1）针对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

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刺激措施，政府能够鼓励金融机构增强对陕北等地的服务范围，以便提供更广泛的金融支持。政府还可以建立特别基金或奖励计划，鼓励社会各界参与这些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促进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专业技能向这一领域倾斜。

（2）针对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

在西安市和其他地级市，政府的经济与产业升级投入为数字普惠金融营造了优越的政策与资金环境，吸引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的集聚，推动其创新应用，并与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服务质效。同时，旺盛且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进一步凸显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对当地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3）针对陕南地区。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当地居民和企业的金融服务接入度，通过定制化服务支持陕南的特色产业发展。特别是在商洛等较不发达地区，提升金融基础设施的范围和质量，促进金融资源均衡分配，推动经济增长。加强环境保护，推进数字化治理体系，

实现全面监测、广泛连接和多方共治。

(4) 加强区域间的合作。

政府应出台措施支持陕南、陕北与关中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区域合作，通过设立特别基金、提供财政和税收激励等方式，促使金融机构、科技创新公司及社会团体之间的跨区域协作，构建跨区域协作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并建立跨区域监管制度，确保合作的健康持续。

5.2.4 强化风险防范，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变得更加复杂，它为金融监管带来了额外的难题以及新的风险和挑战。因此，监管机构需增强对风险的监管与预防措施，确保数字普惠金融的安全与稳健发展，从而持续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1) 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监管标准和规则。

建立统一的风险控制框架，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要求所有数字普惠金融机构严格遵守。出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确保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时的合法权益，设立专门的数据隐私保护标准，严格监管用户数据的处理和存储，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制定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操作规程，确保金融机构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建立反洗钱数据库并与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数据共享和协作。设立专门的执法机构，对金融机构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加大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监管规定得到严格执行。

(2) 加强对数字经济的监控和评估工作。

构建覆盖全省的数字经济统计监控体系，实时监测数字普惠金融的各项关键指标，确保及时获取准确的数据。制定详细的评估标准，对全省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并定期发布数字经济发展报告，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设立数字经济发展奖，对表现突出的区域、机构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激励更多参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国家和省级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各项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定期检查各地政策落实情况，确保政策真正落地。

参考文献

- [1]Allen F, Demirguc-Kunt A, Klapper L, et al. The 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Understanding ownership and use of formal accoun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16, 27: 1-30.
- [2]Anzoategui D, Demirgüç-Kunt A, Pería M S M. Remittances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Evidence from El Salvador[J]. *World Development*, 2014, 54: 338-349.
- [3]Beck T. Finance and growth - lessons from the literature and the recent crisis[J]. *LSSE Growth Commission*, 2012, 3: 01-06.
- [4]Christopher A S, Himmelstein D U, Woolhandler S, et al. The effects of household medical expenditures on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8, 108(3): 351-354.
- [5]Fritz M, Koch 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patterns around the world: Structural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teady-state economy[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6, 38: 41-48.
- [6]Huang H C, Lin S C. Non - linear finance - growth nexus: A threshold with 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 1[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9, 17(3): 439-466.
- [7]Kapoor A.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dian economy[J]. *Futures*, 2014, 56: 35-42.
- [8]Klapper L. The role of factoring for financing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6, 30(11): 3111-3130.
- [9]Lauer K, Lyman 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mplications for customers, regulators, supervisors, and standard-setting bodies[R]. *The World Bank*, 2015.
- [10]Lusardi A. Financial literacy and the need for financial education: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J]. *Swis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9, 155(1): 1-8.
- [11]Manyika J, Lund S, DC W, et al.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J]. 2016.
- [12]Mao J, Wang Z, Ma T. Dynamic Evolu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Distribution in West China[J]. *Land*, 2023, 12(11): 1975.
- [13]Mlachila M, Tapsoba R, Tapsoba S J A. A quality of growth index for developin

- g countries: A proposal[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7, 134: 675-710.
- [14]Mo Y, Mu J, Wang H.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Urban - Rural Income Gap of China from a Spatial Econometric Perspective[J]. *Sustainability*, 2024, 16(7): 2641.
- [15]Morgan P J. Fintech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in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J].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22, 17(2): 183-208.
- [16]Rasheed R, Siddiqui S H, Mahmood I, et al. Financial inclusion for SMEs: Role of digital micro-financial service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 5(3): 571-580.
- [17]Ruiping J, Shuo W.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Digital Finance[J]. *Front. Soc. Sci. Technol*, 2020, 2: 77-80.
- [18]Sabatini F. Social capital as social networks: A new framework for measurement 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ts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9, 38(3): 429-442.
- [19]Su R, Zheng T, Zhong Y, et al. Rol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for high-quality business development: A study of China's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 policy[J]. *Sustainability*, 2023, 15(15): 12078.
- [20]Wang X. A Study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Based on the Impact of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J].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23, 6(11): 70-78.
- [21]安淑新.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 *当代经济管理*, 2018, 40(09):11-17.
- [22]陈慧卿, 陈国生, 魏晓博等. 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21, 41(03):184-191.
- [23]程云洁, 段鑫.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来自中部地区 79 个地级市的经验数据[J]. *调研世界*, 2022, (06):23-37.
- [24]翟元慧, 周勇, 李凯.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J]. *武汉商学院学报*, 2023, 37(04):58-65.
- [25]董玉峰, 陈俊兴, 杜崇东.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理论逻辑、模式构建与推进路径[J]. *南方金融*, 2020(02):64-73.

- [26]冯俏彬.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途径[J]. 经济研究参考, 2018, (30):34-35.
- [27]冯兴元, 孙同全, 董翀等. 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内涵、指数构建与测度结果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10):84-105.
- [28]傅利福, 厉佳妮, 方霞, 等.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机理及有效性检验[J]. 统计研究, 2021, 38(10):62-75.
- [29]郭峰, 熊云军.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测度及其影响研究: 一个文献综述[J]. 金融评论, 2021, 13(06):12-23+117-118.
- [30]郭华, 张洋, 彭艳玲, 等. 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20, (12):66-80.
- [31]郭沛瑶, 尹志超. 小微企业自主创新驱动力——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的证据[J]. 经济学动态, 2022, (02):85-104.
- [32]胡滨. 数字普惠金融的价值[J]. 中国金融, 2016, (22):58-59.
- [33]胡晨沛, 吕政.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与国际比较——基于全球 35 个国家的实证分析[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0, 27(05):91-100.
- [34]黄余送.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探索[J]. 清华金融评论, 2016(12):37-40.
- [35]蒋竹媛.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 商业经济研究, 2020(10):56-59.
- [36]李建军, 王德. 搜寻成本、网络效应与普惠金融的渠道价值——互联网借贷平台与商业银行的小微融资选择比较[J]. 国际金融研究, 2015, (12):56-64.
- [37]李旭辉, 朱启贵. 基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研究[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8, (09):107-117+128.
- [38]梁多佳.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 海南金融, 2024, (03):3-13.
- [39]林毅夫, 付才辉, 任晓猛. 金融创新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 金融论坛, 2019, 24(11):3-13.
- [40]刘雅欣.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就业质量[J]. 调研世界, 2023, (12):45-54.
- [41]刘亚雪, 田成诗, 程立燕. 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及比较[J]. 经济学家, 2020, (05):69-78.
- [42]刘宇桦, 吴昱祺.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J]. 中国商论, 2024, (02):117-121.

- [43] 刘志彪. 理解高质量发展:基本特征、支撑要素与当前重点问题[J]. 学术月刊, 2018, 50(07):39-45+59.
- [44] 马茹, 罗晖, 王宏伟等. 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9, (07):60-67.
- [45] 聂秀华, 江萍, 郑晓佳, 等. 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研究[J]. 金融研究, 2021, (03):132-150.
- [46] 聂长飞, 简新华.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省际现状的分析比较[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02):26-47.
- [47] 师博, 任保平. 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分析[J]. 经济问题, 2018, (04):1-6.
- [48] 史丹, 李鹏.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国际比较[J]. 东南学术, 2019, (05):169-180.
- [49] 宋晓玲, 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 财经科学, 2017(06):14-25.
- [50] 王刚贞, 陈梦洁.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渠道机理与异质特征[J]. 财贸研究, 2022, 33(10):45-56.
- [51] 王婧, 胡国晖. 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 金融论坛, 2013, 18(06):31-36.
- [52] 王年咏, 张珂, 张目.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05):125-130.
- [53] 王晓. 国际组织对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的探索综述[J]. 上海金融, 2016, (10):75-77.
- [54] 王颖, 曾康霖, 论普惠:普惠金融的经济伦理本质与史学简析[J]. 金融研究, 2016(02):37-54.
- [55] 王永昌, 尹江燕. 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及趋向[J]. 浙江学刊, 2019, (01):91-95.
- [56] 魏敏, 李书昊.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11):3-20.
- [57] 吴晓求. 互联网金融:成长的逻辑[J]. 财贸经济, 2015, (02):5-15.
- [58] 吴志军, 梁晴.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比较与战略路径[J]. 当代财经, 2020, (04):17-26.

- [59]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11-22.
- [60]徐梦佳.数字普惠金融对黑龙江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山西农经,2023,(23):185-188.
- [61]徐亚平,潘韵婷,史依铭.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我国217个地级市的证据[J].金融发展研究,2023,(01):47-56.
- [62]杨刚,张亨溢.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J].统计与决策,2022,38(02):155-158.
- [63]杨伟民.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18,(02):13-17.
- [64]叶文辉,龚灵枝.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理论分析与展望[J].经济问题,2023,(12):49-57.
- [65]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47-67.
- [66]殷培伟,谢攀,雷宏振.国家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及差异分析[J].经济学家,2023,(03):68-78.
- [67]詹新宇,崔培培.中国省际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评价——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16,(08):40-53+39.
- [68]张玲,董成立,张伟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6):20-30.
- [69]张蓉.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以泰安市为例[J].中国农业会计,2023,33(22):115-117.
- [70]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经济研究,2019,54(08):71-86.
- [71]张震,刘雪梦.新时代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J].经济问题探索,2019,(06):20-31+70.
- [72]赵晓鸽,钟世虎,郭晓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金融错配缓解与企业创新[J].科研管理,2021,42(04):158-169.
- [73]郑万腾,赵红岩,范宏.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J].科研管理,2021,42(04):138-146.

致谢

在这篇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向所有在我求学路上给予帮助和支持的人们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马润平。在论文的选题、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撰写过程中，马老师始终给予我无微不至地指导和帮助。他不仅在学术上为我指引方向，还在生活中给予我很多关怀和鼓励，使我能够克服学习和研究中的重重困难，顺利完成学业。马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师德让我受益匪浅，并将在我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断激励我前行。

其次，我要感谢学校的各位老师。在课堂上，他们以丰富的知识和生动地讲解开阔了我的视野，提升了我的学术素养。特别是在研究过程中，各位老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无论是专业课的老师，还是在研究期间给予指导的其他老师，他们都在不同的方面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在学术上给予我许多启发和帮助，还在生活中给予了我无尽的关怀和支持。我们一起度过了无数个难忘的日夜，分享了彼此的喜悦与困难。他们的友谊和支持是我珍贵的财富，也将成为我一生的美好回忆。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在我求学期间给予了我无私的爱和支持，他们的理解和鼓励是我坚持不懈的动力源泉。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们总是无条件地支持我，给予我勇气和力量，使我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朝着目标不断前进。在此，我谨向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完成这篇论文的重要动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努力，不断前行，以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和厚爱。